

《臺灣社會學刊》第 66 期
2019 年 12 月·頁 55-124 【研究論文】
10.6786/TJS.201912_(66).0002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時刻： 危機、典範競逐與新古典經濟學者的 進擊

夏傳位

055

臺灣
的
新
自
由
主
義
時
刻

作者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主編藍佩嘉與編委會的精闢建議，相當程度改善了本文的論證及呈現方式。另本文在最初撰寫過程中，承蒙謝國雄老師幫忙閱讀初稿，並與作者多次討論，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9.07.31 接受刊登：2020.01.03

夏傳位(✉)

國立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
通訊地址：90003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E-mail: xia0616@gmail.com

摘 要

在臺灣，新自由主義為何能突破發展型國家的價值與世界觀而崛起？本文聚焦過去文獻皆忽略的角色：新古典經濟學者，是他們抓住了1970年代二次石油危機以及1980年代初期總體經濟失衡所賦予的機會，透過辯論、遊說與宣傳，帶來一套新的認知框架與理解危機的因果故事，翻轉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價值階序，促成1985年全面自由化政策，也讓他們從決策邊緣邁向核心。

本文主要問題意識在於探討：新自由主義理念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出現、透過什麼管道散佈，又如何被接受並影響政策？從歷史制度論出發，我論證在1980年代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的挑戰下，舊的發展型國家典範失靈，而新自由主義通過了「經濟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的考驗，才為當局採納作為務實解決問題的手段。但由於落實階段缺乏「行政可行性」，並受到舊發展型國家官僚的制衡，以致於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化路徑呈現溫和且務實的特色，發展型國家傳統只是逐漸撤退。

最後，本文也針對主流詮釋提出一項方法論反省：新自由主義化既是政商結盟與階級利益分配的政治過程，也是政策認知框架與意義系統的轉換，涉及利益、理念與制度變遷之間相互糾結的互動及多重因果關係，不宜做片面、抽離的理解。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歷史制度論、政策典範

Taiwan's Neoliberal Moment: Crisis, Paradigm Competition and the Ascent of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Chuan-Wei Hsia

Department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glected role of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who used opportunities created by two oil crises in the 1970s and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in the 1980s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a new interpretive framework. The framework facilitated a comprehensive liberalization policy that dictated government policymaking from the periphery.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is used to argue that political leaders adopted neoliberalism as a practical problem-solving tool in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developmental paradigm to cope wit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rises in the 1980s, since neoliberalism exhibited bo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viability. However, a lack of administrative viability resulted in neoliberal ideas being compromised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being checked by nationalist and conservative factions. Neoliberalization is not only about political-business alliances (as mainstream arguments suggest), but also about cognitive framework changes involving a complex interplay of interests,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Keywords: neoliberalism, developmental state,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policy paradigm

在落後國家，優秀人才大都集中於政府機構，政府是對於落後狀態的最先覺醒者，是對於新事物新觀念的最先接受者。

—尹仲容（1960：175-176）。

由銀行增加新的貨幣來貸放給企業……實在是一種「竊盜行為」……等於銀行幫助借款人施展「五鬼搬運法」去搬運別人財物來供他們使用。

—蔣碩傑（1982：73）

一、問題意識

臺灣曾經是世界上最典型、最成功的發展型國家，政府領導經濟的角色有著深厚傳統；「發展」是為了追求國家的整體利益，而非一己私慾。在此傳統中醞釀的價值與世界觀經典地反映在文章開頭引述的尹仲容之一段話上。尹仲容是臺灣經濟政策的重要領導人與奠基者，在1950年代曾有「經濟沙皇」之稱。這樣的世界觀跟新自由主義側重個人經濟自由的思維相差極遠。

可是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臺灣啟動了廣泛而全面的經濟自由化政策，範圍涵蓋了貿易、金融、投資、產業、國營事業私有化等等，具體內容有（行政院經建會1988：184）：

(1) 貿易自由化：包括進口關稅降低、進口限制解除、海峽兩岸貿易擴大、對國際經濟事務的積極參與等。

(2) 金融自由化：包括利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開放民營銀行及保險公司設立、開放證券商新設、外匯管制放鬆等。

(3) 產業發展自由化：包括農產品開放進口、國營事業私有化、國內金融及其他服務業自由化等。

(4) 投資自由化：包括國人對外投資及華僑、外人來我國投資的自由化等。

(5) 其他自由化：包括因推動經濟自由化而衍生的教育自由化、勞動市場供需變動以及對環保的影響等。

這些改革背後的一個關鍵領導人物是經濟學者蔣碩傑，1985年召開「經濟革新委員會」確立上述改革項目，他正是擔任總召集人。新自由主義者信仰個人經濟自由、捍衛私人絕對產權、激烈反對政府干預市場（Harvey 2005: 2），此一價值與世界觀也反映在文章開頭引述的蔣碩傑之一段話上，其中蔣把政府對重點企業的補貼——這是發展型國家的典型作法——視為對一般人民的「竊盜行為」。

這兩人分別對臺灣經濟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可是短短二十年間為何價值與世界觀出現如此劇烈的轉折？反過來問：臺灣是一個有強烈發展型國家傳統的地方，價值與世界觀都與新自由主義截然不同，為何新自由主義還能生根茁壯？

解釋臺灣新自由主義崛起的既有文獻，並未注意這個謎題，也無法從中擷取資源提供恰當的解答。例如政治經濟學觀點，從本土政權與新興資產階級在民主化過程中的政商結盟關係，解釋自由化、私有化政策落入金權政治的尋租與壟斷（王振寰 1996；朱雲漢 2000；張晉芬 2002；Tsai 2001；張鐵志 2008），並未賦予價值與世界觀任何重要的作用；而發展型國家轉型論則直接否認發展型國家的價值與目標出現重大變化，認為國家在經濟自由化的過程中仍維持一個介入但轉型的角色（Weiss 2000；Chu 1999, 2007）。

但上述謎題的重要性，在於新自由主義跟特定經濟思想的昂揚及制度化有關。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歷史背景是1960年代末福特主義積累體制的危機，促使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分別發動政治革命，拆解福特主義體制及福利國家對市場的重重束縛，形成更有利資本積累的條件與環境（Harvey 2005）。此一革命以新古典經濟學，尤其是貨幣主義（monetarism）為基底，推動過程正是貨幣主義理念逐漸被政治化及制度化成為國家經濟體制與政策之一部分（Blyth 2002: 139-151; Harvey 2005: 19-25），因而政策內容相當具有系統性與計畫性。一個典型的新自由主義計畫以「市場機制」為核心概念，通常包含減稅、國營事業私有化、削減福利國家、勞動市場彈性化、鼓勵自由貿易及資本自由流動等政策內容。

在這個用法中，新自由主義指涉的是政策典範（policy paradigm）。分析尺度聚焦在一國之內的經濟政策，但背景是新自由主義的跨國傳布、模仿與在地化調整。「政策典範」一詞指涉隱藏在明示的政策內容背後、由相關概念及標準所構成一整套相關連的體系，提供觀看事物的詮釋框架（interpretive framework），並賦予各項政策內在的關聯與連貫性（Hall 1993）。

於是，若如政治經濟學者所言，自由化、私有化政策是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的實現，那麼我們應該看到新自由主義在價值與論述上的傳播與勝利，並替各相關行動者（政策制定者、資本家與經濟學者）提供行動策略及指引，以實現其利益與目標。若如發展型國家轉型論者所言，發展型國家仍頑強存續，那麼也涉及評估發展型國家理念與新自由主義在論述上的競爭狀況，及各自擔綱者在相關政策場域的角力是否導致典範變遷。

臺灣在1985-1990年之間推動的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就外觀而言，同樣具有強調貫徹「市場機制」的系統性特點，並以之

為正當化理據。例如，蔣經國在1984年4月10日第九次總統府財經會議，要求官員們建立一個「充分競爭」的經濟環境，並且善用臺灣經濟的「比較優勢」，被認為是最早的自由化宣示之一（行政院經建會 1984：73-75；Hsueh et al. 2001: 71）。同年6月，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施政報告時，宣告今後施政朝「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基本方向，經建會（1988：184）後來檢討自由化政策落實成果時，強調「自由化的整體配合問題……推動必須是全面性的，否則易形成跛腳式的自由化，不僅會使效果大打折或相互抵消，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由上可見，1980年代中期以來，市場及其周邊相關概念愈來愈被主政者視為解決經濟停滯的良策，換言之，新自由主義式政策工具的接受度及正當性愈來愈高。不過，不能據此斷言新自由主義已經全面獲勝，因為1980年代初期，國家也積極推動資訊、電子、汽車等策略性工業取代石化業，籌設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同樣需要考量的是國家角色是否經歷真實的轉換。

但過去文獻長期忽略了隱身在這股自由化風潮背後的主要推動者與鼓吹者，也就是信奉貨幣主義的經濟學者；而經濟學者居多的經建會亦直接參照與觀摩了英國大規模私有化經驗作為學習對象（張晉芬 2002：5；行政院經建會 1991）。這就涉及運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典範作為系統推動政策的指導方針。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沒有這群新古典經濟學者的努力，自由化政策會以此種徹底而全面的面貌提出，其所造成的實質轉變亦無庸置疑。¹ 儘管這些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被稀釋或抵消，例如舊發展型國家官僚是否在執行中陽奉陰違，或挪用、轉化以促進發展型國家目標？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聚焦這批新古典經濟學者的歷史角色與作用，以理解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的崛起過程。主要問題意識在於

1 這可從對照自由化政策實施前後的制度環境得知，亦即經濟體的開放及自由程度大為增加。一項有用的資料彙集與整理，請見臺灣省新聞處（1990）。

探討：新自由主義理念在什麼樣的社會條件下出現、透過什麼管道散佈，又如何被接受並影響政策？而核心論點則在指出，新自由主義化既是政商結盟與階級利益分配的政治過程，也是政策認知框架與意義系統的轉換，涉及利益、理念與制度變遷之間相互糾結的互動及多重因果關係，不宜做片面、抽離的理解。

二、文獻回顧

以下第一、二小節先回顧兩種解釋1985年前後的大規模經濟自由化轉型的文獻。該兩種文獻都無法回答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為何新自由主義能突破發展型國家根深蒂固的價值與世界觀而成長茁壯？原因即在於利益與理念的分離處理，以及忽略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角色。第三小節從歷史制度論的傳統出發，探討經濟理念是一種怎樣的意義系統？在哪些制度場域，透過什麼方式影響行動者，與利益的關係為何？當它們轉變成政策典範，又如何透過新、舊典範之間的競爭與取代機制，鞏固成為主導的政策？

（一）政治經濟學的解釋：民主化的經濟後果

政治經濟學者的分析焦點是經濟政策的政治過程及後果。他們揭露經濟自由化政策在現實執行中成為政商勾結的淵藪，並聚焦在後威權政體的民主化過程、本土政權及新興資產階級的結盟關係，以解釋自由化、私有化政策落入金權政治的尋租與壟斷。

「政商結盟」解釋的問題在於不能完全說明自由化的原因、動力及影響，通常都要加上其他變項，從而造成解釋內在的不一致。蔡明璋對這點表達得很清楚：資本家和國家菁英建立起

特殊政商關係，並對政策發揮較大影響力，都是在1987年蔣經國死後，國民黨轉型成為軟性威權政體之後才出現的事情（Tsai 2001: 365）。但在此之前，全面自由化規劃早已定案，並且貿易與金融體系的自由化早已啟動。² 政治經濟學最多只能說明政策在「鞏固」（consolidate）階段受到民主化分配政治的影響，但不能解釋政策為何「發軔」（initiate）。於是，蔡明璋尋求兩段式的解釋機制：政策發軔源自總體經濟失衡與美國壓力，最初只是一個短期穩定措施，沒有任何市場基本教義的想法；但是到了民主化進一步發展，李登輝需要拉攏本土財團以對抗國民黨非主流派之時，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才加速並得到鞏固。

張晉芬檢視公營事業民營化的歷史，也呼應上述見解。她觀察到，雖然1985年「經濟革新會議」的代表猛烈抨擊公營事業的效率低落與弊端，掀起了自由化與私有化的聲浪，但當時俞國華內閣並沒有明顯動作，直到五年後才提出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時間落差顯示，政商結盟才是政策落實的真正原因（張晉芬 2002: 11）。³ 但自由化與私有化最初何以成為政策選項？張晉芬訴諸新自由主義本身對朝野政黨及輿論的廣泛吸引力，作為獨立解釋變項，它不是推動政策的真正原因，但至少是「掩飾粗糙的決策過程和利益輸送行為的護身符」（ibid: 16），這是她強調「經

2 陳添枝(1999)爬梳貿易自由化歷史之後指出，解除進口管制最艱鉅的部分在威權體制末期(1987年以前)就已經完成，譬如1985-1986年同時取消石化業上下游的「產銷協調」（等同於開放石化產品進口）、開放日本製電視機、錄放影機進口以及開放汽車業投資（打破裕隆、福特等寡占局面），由於政治高壓手段仍有效，其間並未遭遇太多抵抗。陳文也顯示，企業界對於貿易自由化政策的利益是分歧的，有獲利也有受害，並非只有一種聲音。

3 相較之下，王振寰試圖用「政商結盟」一貫地解釋自由化政策之發軔。最重要的例證是1985年召開的「經濟革新會議」，代表石化資本的王永慶在會中積極合縱連橫，支持自由化政策，這意謂著臺灣資本家第一次進入行政體系內，成為政策諮詢對象，「使得長期無制度管道與官方溝通的資本家有了發言位置，使得國家機器、學界與資本家的『三位一體』連結起來」（1996: 73）。這一方面過度放大王永慶的角色，忽略了自由化作為理念與政策，在此之前已經有相當長的提倡與醞釀期，俞國華在會議召開前一年已經宣示自由化的改革方向；另一方面也理所當然地將資本家的「利益」與自由化劃上等號，不認為有必要解釋：當石化資本是國內市場保護的既得利益者時，為何舊制度不再能促進資本家利益？為何資本家認為自由化政策更能促進他們的利益？本文在第七節第三小節處理這個問題。

濟迷思批判」的原因：「經濟邏輯的迷思不只是為私有化政策提供了正當性，即使當後來政策執行的結果受到質疑時……執政者和輿論也多歸咎為執行手段的錯誤，而不願意檢討政策」（ibid: 12）。瞿宛文在檢討推動私有化的動力時，也出現類似「利益」與「理念」的區分，首要動力是「錢權交換」，即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瞿宛文 2004：39）；其次則是「全球性的自由市場迷思瀰漫的影響」，在臺灣特定的脈絡中跟政治的反威權運動成功結合在一起（瞿宛文 2011：268），即公共政策論述的問題。

政治經濟學者的問題在於，將理念與利益分離處理，造成對兩者的理解都是抽離而片面的。首先，新自由主義漸增的吸引力與影響力是一個社會過程，在特定環境下，由佔據特定結構位置的團體推動，並有特定的議程（agenda）。但除了瞿宛文零星的評論之外，政治經濟學者並沒有花時間去解釋理念擴散的過程與邏輯，只當成既定事實，在需要時輔助解釋「錢權交換」。但就像大多數政治經濟學者作品所顯示，錢權交換需要被正當化，已經預設新自由主義霸權深入人心。於是本文開頭所提，臺灣從相信國家經濟角色到質疑的轉變，就成了一團迷霧。

（二）發展型國家轉型論：否定新自由主義

發展型國家學者則堅持，1980年代經濟自由化政策雖然看起來規模與幅度都屬空前，但其實全在國家小心謹慎的掌控之中，並以循序漸進的步驟實施。論者指出中央銀行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扮演再管制（re-regulation）角色（Thurbon 2001）；同時政府也從未放棄提出新的產業政策（Dent 2003）；而政商關係在民主化後雖然惡化值得憂慮，但並未嚴重到摧毀發展型國家能力的程度（Cheng and Chang 2003）；1980年代末期科學園區之成功，也代表了發展型國家的制度翻新（Chu 1994, 2007；瞿宛

文與安士敦 2003)。此觀點鮮明地反對新自由主義有實質影響力——即便它存在於國際壓力之中，這段時期的主旋律還是發展型國家的延續及創新，本文從而稱其為轉型論者。

轉型論者主張，至少在經濟官僚之間，發展型國家的價值與世界觀並沒有出現巨變，大規模實施自由化政策是另一波「以夷制夷」、「向西方學習」的戰略，藉著加速開放與引進外資，提供改革壓力並促進本土企業適應國際競爭，最終仍是為了完成產業升級與國家富強的目標（Weiss 2000: 47；趙耀東 1983）。換言之，轉型論者認為，新自由主義理念只有在工具利用的層次上被接受，並未深化到價值與世界觀的層次。

這一看法可以在兩個層次上商榷：其一，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角色是否被忽略？這可以用一個「反事實」（counterfactual）推論來陳述：倘若沒有新古典經濟學者長期攻擊國家領導產業的作法，並提出一套內在連貫的政策替代選項，自由化會以短期內規模幅度空前的姿態出現嗎？其次，轉型論者也可以退讓承認新古典經濟學者在自由化政策「發軔期」的歷史成就，仍主張在政策「鞏固期」，仍是同一批發展型國家官僚主導，而新古典經濟學者的激進主張大多被架空，或只是一種粉飾（window dressing）。這是一個值得嚴肅看待的論點，本文將在第八節時探討。

（三）理念、利益與典範變遷

經濟理念處理有限資源如何分配的問題，為政策提供一整套相關的概念、價值、方法與驗證標準。Dobbin（1997）注意到不同國家的產業政策背後存在著理念上的系統差異，他以19世紀美、英、法三國的鐵路政策為例，說明這些大異其趣的產業治理方式最終必須追溯至不同的秩序觀、效率觀、因果推論及行動（agency）概念上。例如三國的「效率觀」呈現有趣的對比與

反差：美國強調市場（價格機制）是效率的不二法門；法國恰相反，強調市場是非理性的，沒有協調的市場只會讓廠商不擇手段炒短線，斷傷公共利益，專業行政官僚由於以長遠、全局為考量，才是效率之源。英國又是另一番情景，認為眾多中小型企業的活力才是效率之源，政策主要目標在保護中小企業生存，為此可以容許市場聯合壟斷，犧牲競爭。

這是一個相當適切的例子，說明經濟理念表面上看來服膺於追求效益極大化的工具理性，但仍然是文化中介的意義系統，表現在對於「效率」、「秩序」、「因果」等多樣的概念化之上。由此，經濟理念扮演認知範疇的角色，形塑政策並指導人們的行動；而這也相當於 Kuhn 所謂「科學典範」在科學中所扮演的角色。

新自由主義亦是一個制度化的意義系統，其威力往往來自一些簡單化、看似不證自明的因果故事，如效率來自市場與競爭，而政府與國營企業總是壟斷與尋租。將新自由主義視為「政策典範」的研究取徑，大致上都追溯至 Hall（1993）的經典著作。Hall 是歷史制度論學者，歷史制度論的核心概念是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亦即歷史遺留的制度、慣例或結構形成特定路徑，限定後來的政策選擇或面臨新挑戰時的反應，於是強調了制度持續而非變遷的一面（Hall 1986; Pierson 2000）。為了彌補此一缺陷並說明重大變遷，歷史制度論訴諸關鍵時刻，由外在重大事件如經濟危機或軍事衝突等打破制度均衡，帶來斷裂，並逐漸形成新的路徑依賴，朝另一個方向穩定演進，這過程稱作「斷代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

然而，這種解決方式只是將變遷歸諸外部因素，依然沒有解釋制度變遷的內在機制，如何從前一個均衡過渡到下一個均衡。正是為了克服此一缺陷，Hall（1993）訴諸「理念」作為解釋制

度變遷的內生變項，靈感來自 Kuhn 的「典範革命」：在重大危機時刻，舊典範逐漸累積「異例」(anomaly)，卻無法自我修正以解決危機，這給予其他競爭的政策典範及政治團體一個重新定義現實的機會。不同的行動者對危機進行詮釋、動員、說服與鬥爭，以奪取政治權力，最後造成典範的轉移與革命。

Hall 以英國 1970 年代末柴契爾夫人革命為例，說明典範革命通常歷經三個階段：首先，鬥爭發生在政策工具調整，如利率高低的調整；其次，鬥爭發生在使用哪些政策工具以達到特定目標，如要使用貨幣政策抑或財政政策；第三，鬥爭發生在政策目標本身，如充分就業優先抑或打擊通膨優先。Hall 認為前兩項的辯論與調整在常態科學底下也會發生；若三個層次同時發生巨變，那就是典範革命。

至於如何解釋某些經濟理念會成功或失敗，Hall 建議檢視其「接受脈絡」(context of receptiveness) 的三道判準：「經濟可行性」(economic viability) 指涉新理念解決當前經濟難題的能力；「政治可行性」(political viability) 指涉新理念的政治意涵是否能凝聚足夠多的支持者；「行政可行性」(administrative viability) 指涉新理念符合負責官僚機構的長期偏好，並且在其能力範圍之內可以被執行 (Hall 1989: 371-376)。

新自由主義的擴張透過政策典範競爭與革命來完成。這通常發生在專業者組成的制度場域，如政策官僚、經濟學者、智庫、媒體評論人、產業公會等等，但社會大眾也有影響力。當發生經濟危機時，解決問題的外部社會壓力會改變新、舊典範擔綱者之間的勢力均衡，而新典範擔綱者可以透過向民眾宣傳說服及政治動員以挑戰舊典範的領導地位。此一事實亦顯示新自由主義理念的擴張途徑並不限專業者的制度場域，還包括了各式各樣的大眾傳媒及社會場域，其作用是將嚴肅、充滿專業術語的政策辯論

(譬如下文分析的「蔣王論戰」) 通俗化，以簡單易懂的象徵（如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萬能之手）及因果故事（如政府是所有經濟危機的源頭）吸引一般大眾的眼球，並在無數的重製覆述之後，凝煉成格言般的陳腔濫調形式，化為不假思索的常識。

以上是從「傳播者」的角度說明新自由主義擴散的社會條件及途徑。但從「使用者」的角度，經濟理念與行動者之間的關係，可以隨行動者的歷史處境、結構位置及利益感知之不同，有非常不一樣的運用及詮釋方式。我在下文將使用 Swidler (1986) 所說「行動劇碼」(repertoire) 一詞來說明新自由主義作為「組織行動的策略」，被經濟危機中的不同團體及個人用來務實地解決問題，攻擊政敵或進行結盟，以求生存並爭奪利益。⁴ 當經濟理念作為行動劇碼時，是以具體生存情境為導向，與利益感知相互糾結在一起而共同決定行動。理念由於提供一套關於危機發生的原因、責任歸屬及解決方案的因果故事 (casual stories)，可以為利益提供正當表述，或以共同利益為號召進行政治結盟，並作為實現利益的指引與行動路徑。

對既有學術成果的回顧分析，指出了本文重探臺灣新自由主義崛起的任務：首先，它誕生於1970年代末的一場危機，以及後續美國制裁帶來的轉型壓力。危機部分源自發展型國家的成功，但由於既有政策典範無能解決危機，給予新自由主義理念與政策崛起的機會。但在外部壓力與逐漸浮現的新自由主義解方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必然的經濟理性；後世看來正確且唯一的回應，事實上是特定團體長期提倡、建構、鬥爭並擊敗其他競爭路線後的結果。我們需要探討、也是既有研究空白之處，正是臺灣的新古典經濟學者如何透過爭論與說服，將新自由主義政策建構為面對危機的唯一出路。這項工作需要同時考慮利益、理念與制

4 事實上，Swidler (1986: 283) 也主張，科學典範也是以類似「行動劇碼」的方式運作，提供實用導向的行動策略，幫助科學家判斷解釋是否恰當、何謂科學突破以及猜測新研究方向。

度變遷之間相互糾結的關係，從而並未否定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而是將其整合進一個更完整、全面的歷史敘事當中，不否認多重因果關係的共同作用：亦即「新自由主義化」既源自外部壓力，也是內部提倡的結果；既是公共政策論述的鬥爭，也是政商結盟的政治過程（政治經濟學觀點），同時持續受到歷史條件與結構的限制以及競爭團體的制約，因而呈現不均衡發展（發展型國家轉型論觀點）。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

本節就核心論旨「新自由主義理念如何散播及影響決策」，概述研究採取的方法步驟、如何組織與運用資料，以及資料來源：

首先，確認戰後臺灣經濟史上分別發生於1950、1970、1980年代三次有關自由化的重大政策辯論，發生的背景是既有政策典範難以因應重大經濟危機，因此開啟了典範競爭與革命的機會。作者採用論述分析法，從辯論實質內容中抽繹出各方論證背後所預設的認知範疇、判斷標準等，以確立論戰中各方的相互關係及其典範特徵，並描述他們將政策典範運用到當下情境以實際解決危機的策略（或行動劇碼）。

再者，作者避免單獨考慮論述的因果作用，而是將其置於國內、外政經情勢變動的脈絡中，以考察理念的「接受脈絡」，亦即從各項因素與條件聚合下的多線因果關係來判斷理念的作用，並對照後續實際的政策走向、人事與組織更迭，以評估典範競爭的結果。

三次辯論的資料留存狀態不同，只有第三次「蔣王論戰」舉

辦了正式的辯論會，並有出版品完整收錄各方的發言及過程；第一、二次辯論的交鋒過程隱藏在政府機構的大門內，需要研究者利用各種公開文件、說帖、追述、二手研究等資料事後重建其過程與內容。

因此，本文資料來源有以下七種：一、辯論過程的正式紀錄（工商時報 1982）；二、當事人的政策文件、說帖（尹仲容 1957；俞國華 1982；趙耀東 1983；蔣碩傑等 1995a[1974], 1995b；王作榮 1996a[1984], 1996b[1984]）；三、當事人或第三方對政策交鋒的追述與評論，從這些追述中亦可得到各政策典範如何運作的寶貴資訊（蔣碩傑 1985；李國鼎 1993；康綠島 1993；邢慕寰 1993；陳慈玉、莫寄平 1992）；四、關於當時經濟狀態、政策與制度發展的脈絡性知識（期岳 1957；李庸三 1982；葉萬安 1984；李國鼎 1993；陳永華 1981）；五、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變遷的描繪，這對於分析理念的「接受脈絡」是必要的（Gold 1986；Wade 1990；行政院經建會 1988；Roemer and Chou 2001）；六、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跨黨派人際網絡與理念散佈管道（夏道平 1995；吳惠林 2009；彭百顯 2011）；七、學者的二手研究（陳添枝 1999；Kuo and Myers 2012）。

在資料使用上，或許最關鍵的挑戰是如何確立新自由主義理念透過辯論與競爭，影響了關鍵決策者如蔣經國和俞國華，導致 1985 年確立全面自由化政策。在蔣經國部分，作者透過蔣經國財經決策的原始資料，⁵ 以及財經官員近距離跟蔣經國互動的回憶錄（王昭明 1995；李國鼎透過康綠島 1993 的口述回憶；葉萬安 2009），以重建蔣經國的經濟政策思維，說明新古典經濟學者在「緊縮貨幣、打擊通膨」上契合蔣經國的憂慮，解釋了前者的政策建言在 1970 年代能夠部分被當局採納的原因。另外，透

5 如：《蔣總統經國言論選集第一輯》（蔣經國 1980），其中包含所有歷年財經首長會議指示。

過嚴謹的蔣經國傳記（陶涵 2000），也可以一窺晚年蔣經國是從一個更大的政治關懷（亦即國民黨政權延續及兩岸未來的政治統合）看待經濟自由化的意義。1985 年後，蔣經國將所有財經決策的權力交給俞國華，而正是後者，宣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並召開經革會推動全面自由化政策。本文透過俞國華（1999）的口述傳記以及王昭明（1995）回憶錄的交叉印證，確認俞國華在這個關鍵決策上事先諮詢了經濟學者的意見，而這些學者大部分在幾年前都曾參與「蔣王論戰」，在經驗上建立起新自由主義辯論影響實際決策的相關性。

最後，關於蔣經國、俞國華、趙耀東等人心態、想法的記述，主要來自其部屬貼身觀察的回憶錄，這方面資料不多，以致多處資料來源都共同有王昭明（1995）。原則上，這類事實建構最好能有多種資料來源相互支持，在最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使用單一來源。幸好本文在多數情況下也能找到其他回憶錄或旁證，與之交叉印證，以確立其可信度。

下一節進入對於臺灣 1980 年代大規模自由化轉型的實質歷史考察及重新詮釋。相較於既有研究將臺灣經濟自由化（或新自由主義化）的時點訂在 1985 年左右，本文將其往前推到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所引發的經濟辯論與改革，以釐清政策典範競爭的起源及勾繪其過程。

四、總體經濟危機與政策典範的競逐

從 1970 年代中期延伸到 1980 年代中期的十年間，臺灣總體經濟連續出現了重大危機：分別是 1973、1979 年兩次石油危機以及 1985 年美國貿易談判壓力。在此之前，經濟決策思維相當排斥「自由放任」、「讓市場作主」的想法，力主尊重市場的學院

派經濟學者無法對政策有實質影響力。Wade (1990: 204, 220) 觀察到，正是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經濟學者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國府官僚體制內部出現齟齬：一邊是以工程師為主、提倡產業保護的經濟部工業局；另一邊則是以經濟學者為主、主張自由開放的經建會。下文將說明，經濟學者的影響力漸增其實是一個更長的過程，起點可以追溯至1973年；而新自由主義轉向跟新古典經濟學者崛起相互重疊，往往是同一回事。

余慶俊(2009: 143)從「出身系統」的角度，將國民黨內財經技術官僚分類為：美援系統、官邸派、資源委員會系統、兵工聯勤系統及K. T. 派(李國鼎英文名縮寫)。這種分類法考慮的仍是人脈及群聚結黨的影響力，並未把派系與「政策典範」的概念連繫起來，將前者作為後者的承載者與倡導者。

然而，認知觀點差異不能直接化約、或對應到派系差異，兩者之間的勾連並非事先存在，也非一成不變，唯有透過行動者對政策的集體詮釋及採取之行動，才能被建構及確認。最佳的辨認方式或許是直接觀察在某些重大政策辯論與鬥爭過程中所形成的不同立場方；我們會發現這些立場方並不是偶然、零星個人的聚合，也反映了系統的出身背景差異，並與先前的派系集體範疇有一定程度的重疊；此外，辯論涉及理念差異，同時也關乎權力。

1954-1958年在財經官僚系統內部發生了一場政策路線的辯論與鬥爭，其結果關鍵地決定了臺灣經濟從進口替代轉型為出口導向模式(康綠島1993: 124-25; Kuo and Myers 2012: 75-84)。這場辯論的內涵、過程及其意義非本文所能完整處理，此處關心的主要是透過辯論所彰顯的幾個重要「政策典範」及其擔綱者。首先提出出口導向改革理念——運用了自律市場(self-regulated market)概念——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者」；而改革主

要支持者是「美援系統」（以下改稱「強國派」⁶）領袖、時為經濟部長兼經安會工業委員會召集人尹仲容，主要反對者（主張第二次進口替代）是「官邸派」大老、財政部長及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席徐柏園。

1950年代，強國派人士認為當時經濟的幾項陳痼如財政困難、貿易赤字、通貨膨脹及失業等，根本原因在於消費大於生產，因此提高生產是唯一解決之道（尹仲容 1957：85）。然而，強國派與官邸派在「如何做」上頭卻出現嚴重歧見。強國派由於其美援系統的背景，經常與美國顧問打交道，認同美方要求國府扶植私人企業的建議，⁷並主張進行出口導向策略。但官邸派則堅信黨的「節制私人資本」意識型態，強調國營事業成長的優位性，主張第二階段進口替代策略（蔣碩傑 1985：155）。1954年，國內生產已經提供77%的國內消費，內需市場趨於飽和；政府甚至需要限制某些勞力密集的民營企業經營家數，以免惡性競爭（Kuo and Myers 2012: 74）。1956年底，中部地區已有三分之一民營紡織廠因產能過剩而歇業；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公會及省進出口聯合會等團體呼籲改革複式匯率制度，以免影響出口（期岳 1957：2）。因此，在1957年年初，經安會工業委員會擬訂第二次四年經濟計畫時，已經將出口工業列為優先發展對象（葉萬安 1984：685）；但根據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說法，是他們以市場模型的系統化分析，為全面廢除複式匯率與貿易管制提供了正當化的理由，並促使尹仲容下定決心推動外銷導向策略（蔣碩傑 1985：155-156；陳慈玉、莫寄平 1992：79-89；邢慕寰 1993：

6 這個稱謂來自吳迎春（1986）。「美援系統」強調的是組織出身所形成的凝聚力，而「強國派」一詞則更貼切地勾繪了這個派系的政策典範，可以更廣泛地包括了被余慶俊（2009）歸類為資源委員會系統人士（如趙耀東）以及所謂 K. T. 派，故本文沿用之。

7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中國分署主任郝樂遜（Wesley Haraldson）曾提出著名的「八點財經改革建議」，敦促國府恢復自由市場機能，出售國營事業等（康綠島 1993：117-119）。另外，美方經常利用技術指導及援助款的核撥權來扶植私人企業，中國人造纖維公司及王永慶的台塑公司即是在此背景下成立（Kuo and Myers 2012: 62）。

238-241)。

這場辯論結果最終也帶來派系權力的消長：徐柏園的兩個重要位子都被撤換，財政部長由嚴家淦回鍋，最關鍵的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主席（因為出口導向策略涉及改革當時非常繁複的匯率系統）由尹仲容瓜代，官邸派勢力退回原來的金融領域，徐柏園於1960年接替官邸派領袖俞鴻鈞的位子出任中央銀行總裁（Kuo and Myers 2012: 83-84）。

透過觀察上述辯論的集體行動與交鋒，並修改余慶俊（2009）的分類，我們可以說，臺灣財經政策圈形成了三個「相互競爭或合作」的政策典範及其擔綱派系：「強國派」、「官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者」。李國鼎的回憶錄（劉素芬 2005：402）⁸以及前述 Wade（1990: 204, 220）的觀察都證實，這三個主要派系的分野及其政策影響持續至1980年代末期，也就是本文要處理的時期。

「強國派」以尹仲容為首，成員大多是美援會出身的財經技術官僚，如嚴家淦、李國鼎、費驊、趙耀東等，也是工業發展的主要擘劃及執行者。Wade（1990: 188-189）形容他們「沒有受過多少經濟學專業訓練，也不會成本效益分析」，對於產業的想像是透過「工程概念」：起飛、可行性、產業聯結、空缺、替代以及漸進擴張。譬如，政府要建造大鋼鐵廠的理由是「填補臺灣基礎建設上的空缺」，設立科學園區亦然。簡言之，該政策典範的核心問題意識在於「產業升級」與「技術追趕」。

「官邸派」以圍繞著蔣家官邸、與夫人蔣宋美齡（孔、宋家族）關係密切的家臣為主，如俞鴻鈞、徐柏園、俞國華等人。他

8 李國鼎在回憶錄指出，財經技術官僚系統中有一條最主要的分野：歷任經濟部長中具理工背景者超過8成，但在歷任財政部長及中央銀行總裁中，則罕見有理工背景之人；這主要指向強國派與官邸派在政策認知上的分工（或差異）。

們的影響力大多集中在財政金融決策圈，實質掌控著臺灣的總體經濟政策。源自國民黨在大陸時期濫發貨幣引致財政、金融崩潰並丟掉政權的創傷經驗，其政策典範有三項特徵：一、正實質利率；⁹二、保守財政；¹⁰三、低通貨膨脹率。¹¹他們有著濃厚的帳房保守性格，量入為出及維持穩定——通常意謂著對現狀的最小改變——是其行動最高指導原則。

在1980年代以前，強國派和官邸派一直維持著共治的局面，一邊主導經濟發展，另一邊主導財政貨幣。他們尊重對方在各自主宰領域內的權威，衝突則來自於領域對撞。譬如1950年代末出口導向策略跟貨幣政策主導權的對撞；又或者當央行以打擊通膨為最優先考量，而將工、商業財務負擔置於次要地位之時（王耀興1981；李庸三、陳上程1983）。

「新古典經濟學者」是指那些首批用經濟學數理模型來分析臺灣經濟現象的學者，最著名的如蔣碩傑、劉大中與邢慕寰等所謂「財經六院士」。¹²他們一貫的認知觀點是將複雜多變的世界化約成簡化的市場模型。該政策典範的核心問題意識是「市場機制」與「國家干預」。雖然這些學者宣稱他們在1958-60年的外匯貿易改革中扮演關鍵的智囊角色，但除了這個短暫的時點以外，長期來看他們對經濟政策一直是批判有餘而影響不足（邢慕寰1993：5）。

9 Wade (1990: 58) 甚至說臺灣是第一個採取高實質利率的開發中國家。

10 經常帳自1970年代轉為正數以後，除了1973-74年及1980-81年受到石油危機衝擊以外，持續年年為正，一直到1988年為止。在這兩次石油危機中，即使經濟陷入衰退，政府仍以大幅刪減支出因應。

11 和南韓相比，臺灣的通貨膨脹率非常低，前者1965-81年平均達15%，臺灣在相同時間中只有8%。雖然維持高經濟成長率，但通膨跟美國和日本卻差不多（Wade 1990: 42-43, 58-60）。

12 指六位旅外（絕大部分是美國）經濟學家兼中研院院士：劉大中（康乃爾大學）、邢慕寰（香港中文大學）、費景漢（耶魯大學）、蔣碩傑（康乃爾大學）、顧應昌（密西根州立大學）、鄒至莊（普林斯頓大學）。

於是，即便在發展型國家鼎盛的時期，臺灣本土仍存在著多元競逐典範與擬似（pseudo）發展主義、但實則是新自由主義的聲音，潛伏著等待大展身手的時機。為何說「擬似」？臺灣新古典經濟學者跟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在政策典範上系出同源，但由於生存情境與歷史條件之不同，導致在概念應用上出現不同的強調與傾向。例如蔣碩傑、劉大中等人建議國府改採外銷導向策略時，事實上是不滿美國顧問團的自由化建議未重視出口潛力，而帶有更多的发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意涵，從而能與強國派的重商主義心態吻合，共同對抗官邸派（陳慈玉、莫寄平 1992：84；Kuo and Myers 2012: 76）。¹³ 除此之外，他們要求國家撤手讓市場機制發揮功能的核心信念與西方新自由主義者如出一轍。此一流派利用 1970 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逐漸擴大影響力，並透過辯論展現為價值與世界觀的對抗。這對後來的全面自由化有影響嗎？接下來便檢視此一過程。

五、第一次石油危機：兩種自由化路線的浮現

（一）攻擊：激進的自由化路線

第一次石油危機造成十餘年來首見的經濟衰退。1973-74 年之間，進口單價上漲 50%，導致出口衰退，國際收支由正轉負，虧損達 GNP 的 7.8%（行政院經建會 1987：269）。行政院長蔣經國多次發表談話，決心貫徹「在穩定中求發展」的經濟政策，「不惜一切力量，來求物價的穩定」（葉萬安 2009：48）。

1974 年，「財經六院士」發表對最高決策者的建言書〈今後

13 作者感謝國雄老師指引我思索此一問題。這一點深具意義，顯示臺灣的新古典經濟學者與發展型國家官僚之間並非涇渭分明、全然對立，他們曾經相互合作過。這對臺灣新自由主義發展路徑有什麼影響？見本文第八節的分析。

臺灣財經政策的研討〉（以下簡稱〈研討〉），倡議更徹底、全面的經濟自由化。〈研討〉抓準了政府擔憂通膨失控的時機，推銷作者們的貨幣主義（monetarism）信條：通貨膨脹總是源自政府為了刺激經濟或創造就業，妄加操縱貨幣供給的結果。〈研討〉不僅認為政府不該干預市場，更建議成立一個健全而活絡的貨幣市場，達到各項長、短期信用工具全面利率自由化的目標（蔣碩傑等 1995a[1974]：4）。

此外，〈研討〉也隱含著反駁論述上的敵人，亦即「專欄派」經濟學者及報社主筆。¹⁴ 這些人認為通貨膨脹的主因是「外來成本推升」，跟貨幣供給無關。他們關心的是經濟衰退不要危及生產動能。雙方在利率問題上衝突：因為〈研討〉要求調高利率，以緊縮貨幣供給來打擊通膨；而維繫生產動能必須降低利率。

新古典經濟學者發起攻擊的時機、意義與效果，要放在蔣經國的經濟政策思維之脈絡中來理解。¹⁵ 從歷年財經首長會議指示來看，蔣經國的經濟思維最突出的一點是對於通貨膨脹政治效應的戒慎恐懼（出於1948年在上海對抗惡性通膨的經驗）；另一點則是對大型建設的喜愛。以《蔣總統經國言論選集第一輯》1978年5月到1979年12月這一年半之間，蔣經國於會談中的指示為例（蔣經國 1980），¹⁶ 總共收錄18次會談紀錄，議題跟穩定物價有關的就有7次，佔39%；跟經濟建設與公共投資有關的有5次，佔28%，其餘有2次是促進中小企業融資，2次跟國防有

14 他們的見解支持強國派的發展藍圖，可以視為強國派的一支，其中最有名的是王作榮。

15 在威權時代，經濟官僚的政策影響力完全取決於最高決策當局的信任，缺乏制度化的權力；一旦決策當局不信任，撤換往往是彈指之間的事（Wu 2005）。因而六院士趁蔣經國對通膨感到憂心之際所上之建言書，就他們的結構位置而言，是最直接、有力的影響決策方式。即便是蔣聽進去一部分，也可對現有官僚系統產生莫大影響。因此，我們不能以民主時代的學者報紙投書來想像。

16 此選集隔年出版前一年蔣的各方面言論，包括專文、聲明、致詞、講話、談話、指示、祝賀詞、答記者問等等，共有八輯，可說鉅細靡遺。1984年蔣經國身體狀況已經很差，全年只有兩次財經會談，都是跟加速自由化、國際化有關；1985年改為俞國華主持，已沒有指示。

關，1次是引進新技術，1次是促進國中畢業生就業。

當時財經官員的回憶也能印證以上印象。蔣經國在1950年代任退輔會主委時就想蓋大煉鋼廠，跟李國鼎有一番激辯（王昭明1995：84）；而十大建設預估經費對政府財政造成沉重負擔，也曾讓財政部長李國鼎傷透腦筋（康綠島1993：214）。葉萬安（2009：47）說蔣對維持物價穩定的提示特別多；李國鼎在口述歷史中說蔣經國「對財經問題並不十分瞭解，卻很固執。如他對穩定物價這個原則非常執著，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康綠島1993：211）。例如1973年底油價已經漲了5倍，但只因蔣經國曾在1972年9月於行政院講過「物價一年之內不會調整」的話，他堅持一定要守信。經合會秘書長張繼正發言反對，說黑市價格已經漲得十分厲害了，管制有實際上的困難。蔣經國聽了非常不高興，就將經合會降級改組為經濟設計委員會（ibid: 212）。

厭惡通膨和喜愛大型建設兩者之間在經濟邏輯上有矛盾，蔣經國卻不會察覺。但若從政治角度看就不那麼矛盾：兩者都是為了照顧平民百姓、爭取民心。另一個足以彰顯此一特徵的事蹟是：經濟部曾建議調低商業用電價格，調高漁船用柴油價格。但蔣經國否決的理由是：「觀光客為高所得者，不必替高所得者考慮……漁民需要保護，漁船用柴油仍應維持低價。」（王昭明1995：190）就此而言，或可推論，蔣經國經常是從政治角度看經濟。

觀察因應石油危機的實際政策，顯然六院士緊縮貨幣的建議被採納了。政府宣布十一項加強執行穩定物價措施，包括：中央政府總預算只減不增、各項公用事業費率本年內不得漲價、繼續採用信用緊縮措施、設置平準基金貼補差額、實施平價、限價與暫停5層樓以上高樓興建、央行繼續提供低利融資進口重要物資等等（葉萬安2009：50）。

從這些措施也可看出，蔣經國相信政府干預、沒有市場概念，這是他跟新古典經濟學者的重大差異；但兩方在中央政府總預算、緊縮貨幣上有共識。¹⁷在此基礎上，〈研討〉關於貨幣市場的建議也獲採納，隔年（1975）初，蔣經國指示建立貨幣市場為政府之重要財經政策，並準備籌設票券金融公司。由於社會對貨幣工具的需求殷切，¹⁸反應十分熱烈，政府債券經紀人公會成立「發展貨幣市場研究小組」積極進行研究（李庸三 1982：5）。

貨幣市場的結構包括以下三方面：交易商或經紀人、資金供給者與需求者、貨幣市場交易工具；後者指的是滿期在一年以下的信用工具，如國庫券、商業本票、銀行承兌匯票、可轉讓定期存單及政府公債等，其特徵是具高度流動性，容易脫售。

事實上，官方雖尚未准許設立貨幣市場，不代表該市場不存在。過往，商人之間盛行以臺北市迪化街為中心，用遠期支票去「調頭寸」，僅憑個人信用而無擔保，亦是屬於短期信用的融通，這也是貨幣市場的操作，只不過是不為官方所承認的「黑市」。

但即便早已有黑市——也就是有實際供需——存在，官方要設立正式且功能健全的貨幣市場，仍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首先，金融機構幾乎皆為官營且欠缺競爭，只要辦理一般存、放款業務就有穩定收入，也欠缺徵信能力，因此多不願意承做風險較高、利潤較低的「票據承兌」業務；其次，商場上習慣以遠期支票作為融通工具，同時票據法第141條對遠期支票的效力背書，導致本票及匯票的使用習慣無法建立；第三，許多公司行號漏開統一發票逃稅，致使以合法交易憑證為基礎的商業本票或匯

17 這和 Wade (1990: 52) 的觀察一致：臺灣總體經濟政策的傾向跟新古典經濟學教條頗為一致，尤其表現在對通貨膨脹的厭惡之上。

18 目前對於臺灣貨幣市場的歷史回顧，除了強調六院士建言之功外，亦強調當時經濟發展快速且日趨成熟，金融活動的範圍與數量較之先前大為增加，而資本市場上的證券發行及其次級市場交易已甚為活絡，貨幣市場的發展卻頗遲緩；這讓後者成立的條件已臻成熟（陳永華 1981：15）。

票不易產生；第四，在銀行難以取得貸款的廠商習慣向黑市或私人借貸，而擁有短期資金者也習慣用於私人貸放管道。綜合以上各點，在資金供、需雙方皆依慣例進行交易活動之下，路徑相依（path dependence）的慣性讓短期資金市場維持在地下狀態，合法而公開的市場難以建立（陳永華 1981）。

面對上述種種挑戰，六院士建議如何克服？首先，他們建議廢除以6個月定期存款利率作為計算國庫券底價基準的辦法，讓其在公開市場上買賣，由供需決定價格；再以市場上國庫券的貼現率作為標準的短期利率，調整各銀行的存放款利率。其次，六院士建議「鼓勵」銀行承兌或擔保遠期支票、「推廣」工商業簽訂商業期票、「准許」銀行發行存單（certificates of deposits），由自由市場決定均衡利率，「則一活潑有效的貨幣市場即可謂建立」（蔣碩傑等 1995a[1974]：8）。

六院士的建議顯示，他們並沒有將實際市場行動者的慣行、法律及制度納為分析對象，並籌謀改善之道；他們單純預設只要政府不干預國庫券利率、只要短期信用工具廣泛被鼓勵推行，市場會自行有效運作，表現為均衡利率。換句話說，他們的市場概念直接來自抽象經濟學模型，並以此為標準要求建構實際運作的市場，作為成敗與否的判準。相較於其他兩個派系，他們推動的自由化路線是激進的。

（二）回應：審慎的自由化路線

在蔣經國的指示下，〈研討〉的重要政策建議都被採納，但是以官邸派（權責單位是中央銀行）所偏好的方式及步驟來執行。官邸派並不關心市場機制，他們在意的是「設立以便控制」。1973年發行國庫券，1974年准許發行銀行承兌匯票與可轉讓定期存單，1975年開放成立票券金融公司，替短期信用工

具之發行、承銷及買賣提供服務。但出於小心謹慎、害怕金融失序的心理，票券交易商設立資本額的門檻極高，不得少於新台幣 2 億元，並應一次繳足。而中興、國際與中華三家票金公司都有黨營色彩，缺乏競爭（陳永華 1981：23）；一直要到 1994 年，政府才再准許票金公司新設。

市場中流通籌碼的數量及種類都少，主要交易完全集中在商業本票之上。這仍然是受到過去法律、制度形塑的商業慣行影響所致。於是，貨幣市場並未真正發揮決定短期利率的功能，票據或存單的利率仍然盯住銀行定期存款利率，而後者仍然操控在央行手裡（李庸三 1982；蔣碩傑等 1995b[1976]）。¹⁹

這樣綁手縛腳的市場自非六院士提倡的初衷。不過，央行總裁俞國華在一場演講中公開為現狀辯護，頗可以一窺官邸派的政策認知邏輯。首先，他肯定過去利率管制的必要性與成就；其次，他也認同利率自由化已成世界趨勢，央行政策操作應該透過市場力量來影響利率水準；最後，他也在象徵姿態上對貨幣數量學說（即貨幣主義）的真理聲稱致敬（俞國華 1982：7）。

然而，接下來他便解釋為何利率自由化工程只能慢慢來，並抱怨許多配套措施尚未完成：要有法律架構、要招募市場參與者、要塑造市場內部的社會關係、要改變既有商業習慣與文化、要建立銀行徵信的專業能力等等。

李國鼎（1993：58, 62）對此種漸進、謹慎的自由化路線背後之心態與哲學描述得非常精確。他認為，經濟制度的「非政治化」，「不應被視為堤壩的突然潰口，而應該說是一個早就開始

19 六院士倡議成立貨幣市場的初衷，是為了讓央行不再直接控制利率，而是透過貨幣市場或公開市場之操作來調節貨幣供給率。因此，利率自由化是成立貨幣市場的真正目的。再一次，中央銀行在這個目標上展現了極其謹慎的自由化步驟。從央行決定存款最高利率，各種放款利率由銀行公會議定並報請央行核定施行，到定存利率不必受最高存款利率限制，並逐漸放寬放款利率幅度，一點一點逐步鬆綁，直到 1989 年，利率才完全交由市場決定，央行不再設定相關利率水準（陳聽安等 1983）。

的、緩慢而穩健的積累過程……走向自由化有一個長期的啟動過程。」他解釋，政策革新「不是純粹出於思想上的動機」，而總是著眼於「解決明顯的問題、即將發生或實際存在的矛盾」。因此，相對於顯現的問題而言，政策「延時推出」是必要的：「一項正確的政策改革不是太早到達的東西。思想上的顧慮經常阻礙合適時機的選擇……」（ibid: 94），他稱這種政策哲學為「實用主義」。

於是，1970年代的金融改革是多方妥協的產物。它的背景是通貨膨脹造成的總體經濟失衡，強國派從生產面看此一危機，認為要進行產業結構轉型；²⁰ 官邸派與新古典經濟學者則是從金融面看此一危機。而建立貨幣市場（1976年）與外匯市場（1979年）以及從固定匯率改為浮動匯率制（1978年），則是主要成果。然而，這些市場的運作仍十分有限，也受到政府嚴格管控。

從典範競逐的角度，這是一場失敗的革命。然而，新古典經濟學者並非毫無所獲，他們的主張沒有被全然拒斥，而是以特例（ad hoc）方式被另一個典範所吸納與轉化。或用 Hall（1993）對典範競逐所涉及的三個層次來敘述，就是官邸派政策典範採納對方的政策工具（建立貨幣市場），仍維持自己的政策目標（國家控制）。如何解釋此一結果？

我們或許可以透過考察貨幣主義理念的「接受脈絡」之結構特徵來思考此一問題。1970年代初期，一連串發生在內、外的政治經濟衝擊事實上更強化、加深了政府領導經濟的角色（Gold 1986: 97-103）。政治上包括：1971年聯合國取消臺灣會籍、

20 這段時期也強化了策略性工業融資體系，如1975年銀行法大幅翻修，建立了專業及中長期信用體系；1982年組成「策略性工業審議委員會」，選出機械及資訊電子業等策略性工業產品，由政府提供低利融資、技術輔導等獎勵措施（楊雅惠 1995：108）。

1972年日本與臺灣斷交，同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上海公報。這促使政府必須加速改革步伐，以回應內外衝擊並鞏固權力。1972年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開始拔擢台籍菁英，代表了由上而下保守改革的嘗試（王振寰1996：61）。但既然政治上短期不可能再進行更大幅度改革，經濟改革就更形重要。

而1970年代初的經濟情勢也面臨結構上的重大挑戰。自1969年以後，實質薪資成長開始超過國民所得成長，1969-1978年的平均薪資成長幅度是先前的一倍以上（Hsueh et al. 2001: 53），與此同時，中國與東南亞等新興工業化國家正開始加入出口行列與臺灣在國際市場上競爭，這意謂著臺灣在國際貿易的比較利益正逐漸喪失（Wade 1990: 96）。在此背景下，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進行基礎工業深化，而1973-76第六個四年計畫除強調出口導向外，也指示發展以下重點產業：石化、電動機械、電子、精密機械工具、電腦終端機及周邊產品。

由此可見，貨幣主義的激進自由化理念跟此時期著重工業結構調整的改革策略完全背道而馳，這最終根源於對危機的不同解讀。但蔣經國十分關切的通貨膨脹，確實構成強國派及官邸派政策典範難以處理的異例：就像凱因斯主義的核心問題意識是「總需求不足」，將全民就業與通貨膨脹視為相互抵換的關係，而不預期後者會對經濟成長帶來太大困擾一樣；強國派政策典範的核心問題意識是「產業升級」，透過產業結構調整帶來跳躍式成長，通貨膨脹也只是一個常數，而非成長變項。它只能從長期戰略來因應通貨膨脹導致比較利益移位的威脅。長期以來，臺灣財經官僚總是務實地以升息控制通膨（康綠島1993：210-213），此一政策慣習只是基於經驗法則，並無系統性理念於背後支撐。

反之，貨幣主義也主張控制貨幣供給，但有一整套系統化的理念作為支撐，簡單說就是「濫發貨幣，或更廣泛說政府干

預，造成通貨膨脹」，不僅符合國民黨在大陸時期的創傷經驗，也顯得在處理通貨膨脹議題上更具有系統性與連貫性，這賦予了經濟學者介入的施力點。此外，證券市場自進入1970年代起逐漸擴張，這跟1970年以來連續四年擴大貿易順差，淨資本流入，貨幣供給額急速增加，民間資金大量湧進股市有關（彭光治2003：80）。隨著金融交易的種類及數量大幅增加，貨幣市場卻毫無進展。這或許是六院士的政策提議能以有限程度被接納的原因。

但即便是一個受限的結果，這段時期對臺灣經濟自由化的重新詮釋仍有十分重要之意義。首先，它指出了自由化啟動不全然來自外部壓力，同時也來自國內提倡者的行動。外在危機究竟如何因應需要解讀，而對於同一個危機，我們可以看到「強化政府角色」與「徹底自由化」兩種截然相反的策略在此時期都被提出。²¹因此，國內提倡者對於危機的詮釋、因果關係推論及行動方案等，均具有主動性，無法化約至外在危機；其次，這段時期事實上存在著兩種自由化路線的鬥爭：一種漸進謹慎，另一種快速激進。兩者的差異根源於政策典範，亦即「實用主義」與「市場烏托邦」的不同。

當1970年代接近尾聲，另一場危機提供新古典經濟學者再度發揮影響力的舞台。就歷史資料而言，這是臺灣新自由主義世界觀最早、也最系統的一份說明，在發展型國家仍然主導的意義脈絡中，對於重要基本範疇——如「市場」與「國家」——的定義進行全面翻轉與重構。

21 根據 Blyth (2007)，經濟理念很少是不模糊的。任何經濟困境都可以用不同經濟理論來解答並提出藥方。例如1970年代的停滯性通膨有多種解釋：供給面衝擊、貨幣不平衡、勞動市場僵固、政府赤字、長期生產力下降……等等。選用哪一種概念框架來定義危機，涉及利益分配。於是，理念的作用絕不限於符應現實而已，它主動建構現實，也在各種不同的政治行動中扮演關鍵角色。以下分析王永慶1985年在經革會中與經濟學者聯手推動全面自由化，正體現這點。

根據當時見證者的追述，這是一場「轟動全國」、加上電視台轉播「擴散至社會各個階層」的辯論，連蔣經國於同年接見國建會代表時，都特別主動提及此事（鄭優 2012）。但下節深入分析這場辯論的理由，並非基於單一事件的影響力，而是將此辯論看作是新古典經濟學者漫長努力中最具說明性（illustrative）的一場演出，對新觀念與新視角做了最清楚的表述，並被其他經濟學者、專欄作家與記者等以各種形式不斷複製與重述，最終新古典經濟學者定義的自由化路線取得了論述上的正當性，這是 1985 年前後全面改革的背景。

六、第二次石油危機：重構因果連結

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發生。新古典經濟學者與專欄派之間的交鋒再起。蔣碩傑在通膨威脅復臨之際，發表〈穩定中求成長的經濟政策〉一文，企圖延續、落實前階段被執行得半心半意的自由化改革大業。

這篇文章引出了王作榮的長篇反駁。雙方爭執如何因應通膨威脅，尤其是否提升利率以打擊通膨，抑或降低利率以救企業。蔣碩傑於再回覆之時便公開叫陣，一時間兩位當事人及各自陣營的支持者紛紛公開為文，加入戰局；由於深受社會矚目，最後甚至由《工商時報》出面邀集，舉行正式辯論。此即俗稱的「蔣王論戰」或「王蔣大辯論」（工商時報 1982）。

辯論的主題是總體經濟；是有關利率、匯率、貨幣供給成長率、通貨膨脹成因等等高度技術性的議題。但這些議題之所以被熱切辯論，背後隱然跟危機的詮釋及判斷有關。而與前階段不同的是，透過辯論，新古典經濟學者將其秩序觀與效率觀結合現實，逐漸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危機理論：說明危機發生的原因與後

果、誰是加害者與受害者、該如何採取行動解除危機等等。他們也在「重構危機因果連結」的同時，重構了對於「市場」與「國家」等基本範疇的理解。

於是，以下分析的基本單位將不是辯論的實質內容，而是基本範疇與因果連結。由於辯論雙方對於基本範疇的理解與定義已經南轅北轍，在運用範疇來論證時難免形成「歧義」；聚焦於「歧義」，揭露的將不是雙向辯論交鋒（這必須以概念上的共識為前提），而是己方不假思索、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秩序觀與效率觀。另一方面，當一方的定義強加至另一方時，就會形成「誤解」；我們將看到，「誤解」總是一面倒地由新古典經濟學家針對專欄派，而不是相反；同時出來喊冤澄清的責任總是落在專欄派身上，這暗示新古典經濟學家愈來愈能夠主導、界定臺灣社會大眾對於何謂「市場」與「國家」的感受（sensibility）。他們總是能將高度建構的意識型態呈現為毋需多作解釋的事實，而專欄派雖然不同意，卻感到辯解得愈發吃力。

（一）歧義及其鬥爭一：「市場」

這場辯論被當時的參與者之一中研院院士費景漢形容為「自由經濟學派大戰凱因斯學派」或「李斯特（政府干預）大戰亞當斯密（自由市場）」，這也是論戰留給後人最鮮明的印象。不過，當時的工商時報總編輯、也是辯論主辦人阮登發（同時身兼專欄派成員之一），並不同意這樣的標籤。他認為「專欄派應屬於自由經濟學派」，兩方論爭是「自由經濟學派在臺灣地區的鬭牆之爭」（阮登發 1982：65）。

專欄派自認不是主張管制與保護的，而且從來也沒有反對過自由市場。將政府干預與自由市場對立、凱因斯學派與自由經濟學派對立，無異將他們打入反改革陣營（阮登發 1982：65）。

雙方關於市場化、自由化的最大差異，在於「政策優先順序」與「速度快慢」。王作榮（1982b：151）認為實施浮動匯率與利率自由化的條件尚不充足，就算勉強為之，仍然是「在一極小範圍內做人為操作，不發生實際意義」，不值得決策階層過度重視。但接著他說：「至於貨幣與外匯市場之建立及操作機能之形成，應順應經濟情勢逐步發展完成，不必強求，更不必製造假象。本人贊成有秩序的建立現代化之貨幣與外匯市場。」

上面引述的最後一句話像是一種宣示，以堵攻擊者的悠悠之口。但專欄派需要反覆澄清解釋，正好反過來證明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攻擊有效。漸漸地，新古典經濟學家壟斷了關於「市場」的話語權：任何反對直接套用經濟學市場模型的人即是反對市場本身。這種意義脈絡的轉變，讓1970年代居主導地位的漸進、實用主義自由化路線喪失了合理性與正當性，看來更像是反改革的藉口。

退一步看，此一誤解其實反映雙方的秩序觀及效率觀差異。新古典經濟學者認為經濟秩序來自市場，效率也來自市場從束縛中解放。因此王作榮既贊成「有秩序的……建立市場」又主張「逐步發展完成，不必強求」無異自相矛盾；相反地，強國派認為經濟秩序及效率都來自國家審慎、智慧地駕馭市場，自由化過程何能例外？怎能因此說是反自由化？

（二）歧義及其鬥爭二：「國家」

兩派人馬對於國家經濟角色的理解也是南轅北轍，在新古典經濟學者的世界觀中，經濟運作有其獨立的規律和法則，政治干預只會壞事；通貨膨脹也是純粹的經濟現象，要按照市場法則來紓解。這體現了新古典經濟學者「所有秩序與效率源自市場」的觀點。

專欄派則嘲笑新古典經濟學者將市場運作無法抹滅的政治前提包裝成自然法則，就假裝它們不存在。事實上，中央銀行有能力影響、也無法不影響通貨膨脹的政治分配後果，新古典經濟學者的理想「只有在19世紀金本位制，各國中央銀行還沒有設立之下，差可接近」（王作榮 1982a[1981]：54）。很明顯，這是強國派「所有秩序與效率皆源自國家」的邏輯延伸。

蔣碩傑的回答也十分犀利。他創造兩個新名詞來指稱王所說的「人為操縱」，或說對於央行的政治性格下一個普遍評語：「五鬼搬運法」與「金蟬脫殼法」。他認為，如果央行擅自增發貨幣貸予特定人士，這就等於銀行幫助借款人施展「五鬼搬運法」去搬運別人的財物來供他們使用，「不啟人門戶，不破人箱籠，而叫人失去財物」（蔣碩傑 1982：73）。這種作法必然造成通貨膨脹，正好減輕這些人的負債，而他們的資產又早已投資在實物及外匯上去了。於是繼「五鬼搬運法」取得資產之後，又使用「金蟬脫殼法」將債務推卸掉。這樣作法，吃虧的是一般老百姓。但長期下來，老百姓也會採取自衛行動：他們會將存款搬出銀行，盡量換成黃金、實物、外匯或房地產。最後，儲蓄無法有效動員供生產建設使用，整個社會因此付出慘痛代價。

於是，蔣導出他的結論：中央銀行雖是「法定控制貨幣數量機關」，卻絕不能任意增加貨幣，否則其效果與竊盜無異；唯一辦法就是央行鄭重接受貨幣主義的「基本約束」。相對於王點出央行在維持購買力上不可推卸的責任，蔣也勾勒另一幅政治圖像，在這圖像中，「當央行施加影響力時，總是在幹壞事」。

費景漢（1982：153；Fei 1992）指控專欄派企圖鼓勵政府藉操縱利率及匯率替企業團體謀利。他的言論立即遭致其他專欄派的抗議。柯飛樂（第一銀行徵信室主任）在發言時就說：「今天聽了費先生的講話，我始終有一個感覺：我曾經做過費先生所

說的主張嗎？」（工商時報 1982：176）他說明，將利率當作政策工具來運用，並不是要片面降低利率。「在通貨膨脹時自應提高利率，也就是說可高可低」（柯飛樂 1982：155）；王作榮也抗議：「我從來沒有說央行應壓低利率，讓企業家獲得額外利潤。」（工商時報 1982：178）

不過，如果說這僅僅是費景漢誤解，就太低估其中的意涵了。就費、蔣等人來說，當然明白「理論上」政府可以調高、也可以調低利率；但他們仍然會認為「實際上」政府無法戒除政商勾結的習慣，也就永遠無法抗拒調低利率的誘惑。

我們可以看到「國家」一詞的意義正在轉變，這源自於一種將國家視為所有秩序與效率的反面之觀點。蔣碩傑的「五鬼搬運法」和「金蟬脫殼法」預示了一種新形態的政治經濟學，在這種看法裡，國家永遠是一個只會徇私謀利、勾結分贓的惡棍。陳師孟等人（1991）影響深遠的《解構黨國資本主義》在知識系譜上明顯地與此一論述有繼承關係；此一經科學權威認證的惡棍國家觀也迅即受到民間社會的歡迎，尤其是政治反對人士與社會運動人士，以促進自己的政治需要。²²

（三）歧義及其鬥爭三：因果連結

危機理論的核心在於指出前因後果，也就是指認加害人與受害者。在這場辯論中，雙方人馬都忙著重構因果連結，分派加害人與受害者。專欄派訴求過度打擊通膨、緊縮銀根，將會扼殺企

22 誠如張晉芬（2002：57）的觀察：「整體來說，經濟學者、民進黨和報章輿論都是民營化的支持者」。反對黨與報章輿論之所以支持民營化，未必基於好的經濟理由，而是著眼它帶有解構國民黨對政治社會生活全面控制的意涵（瞿宛文 2011），這跟「國家」概念的翻轉有密切關係，表現在反對黨政治論述或社運論述中經常出現「黨國」一詞之上，用以對抗國民黨營造的「大有為政府」。右派自由經濟思維如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思想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原型，跟臺灣民主運動與民進黨的幽微淵源，請見下文。

業生機，他們的加害人是不通世事、只會照套理論的學院蛋頭；而受害者則是參與討論會、同時也肩負著國家富強使命的企業家：王永慶（台塑公司董事長）、徐有庠（遠東紡織董事長）、陳茂榜（聲寶公司董事長）；專欄派訴諸的社會支持還可以從企業家延伸出去，至所有因提高利率而增加負債壓力的債務人（工商時報 1982：70）。

新古典經濟學者眼中的加害人是政府，以及那些受到政府特殊照顧的國營事業、大型民營企業、外銷廠商；至於受害者，蔣碩傑提到「一般老百姓」、「存款戶」因為利率被人為壓低而蒙受損失；後來蔣碩傑的門徒及弟子進一步針對利率管制所造成的「金融壓抑」（financial depression）與「金融雙元性」（financial dualism）現象進行批判，新增了另一群人，如民營企業、中小企業、內銷廠商、家計部門等等（許嘉棟 1983；許嘉棟等 1985；Shea and Yang 1994）。這些團體因為政府干預金融市場而遭到「金融歧視」。於是，新古典經濟學者在金融政策上訴求弱勢者的權益，強調公平正義原則，以對抗專欄派代表的國營與民營大企業既得利益。1990年展開的新銀行開放，其正當性理由即源自於「金融壓抑」說（吳泉源 1993）。

綜合以上分析，新古典經濟學者透過蔣王辯論提出了建構完備的危機理論：危機的根源在於國家任意干預經濟，與特權公、民營企業結盟，排除中小企業與一般家戶，這對市場造成的扭曲「效果與竊盜無異」。此觀點跟強國派的舊典範針鋒相對。不過，兩方卻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望向國家尋找解決問題的能動（agency）。儘管公開辯論，兩方最終訴說的對象仍是最高領導者。

1979-80年的通貨膨脹衝擊事實上並不明顯，國際收支只有小幅虧損，出口甚至未見衰退（Roemer and Chou 2001: 130）。

真正的危機是1980年以後逐年擴大的「出口盈餘」及「超額儲蓄」，以及伴隨而來的美國強烈壓力。不過，這並不妨礙新古典經濟學者的危機理論套用在1985年，因為它已是一個首尾一貫、自圓其說的觀看世界之詮釋觀點。接下來的問題是：在論戰中激辯的兩方為何到1985年前後對於「自由化、國際化」卻有一致共識？這又是一種什麼樣的共識？

七、蔣王辯論與1985年轉型：理念的作用

自1980年開始，鉅額出超及超額儲蓄的總體經濟結構不平衡愈趨明顯，而中美貿易談判日趨頻繁，壓力亦愈來愈大（行政院經建會1988：244-248）。1984年，行政院長俞國華宣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重大方向；1985年召開「經濟革新委員會」，由當時經建會主委趙耀東、經濟學者蔣碩傑、工商協進會理事長辜振甫聯合擔任召集人，正式拍板從貿易、金融、產業到國營事業私有化等全面性的自由化計畫；再兩年，全面自由化的列車開始啟動。

新古典經濟學者的激進自由化路線在1985年首度成為官方政策，這個乍看之下突兀的轉折，他們為此準備了十年以上！根據經革會執行秘書、也是當時經建會副主委王昭明（1995：198, 203）的回憶，此時蔣經國的健康情形已不樂觀，財經重大政策幾乎都是俞國華以行政院長身分總其成，對財經事務握有絕對權力。俞國華在口述傳記中說，他在就任閣揆當天記者會對「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的宣示，來自前一天最後一次參加經建會諮詢委員會議，會中諮詢委員的建議，並與他自己的看法不謀而合（1999：418-9）；而諮詢委員中「網羅了國內最著名的財經專家」包括王作榮、于宗先、陳聽安、陳昭南、黃大洲、陸民仁等

(文現深 1984)，其中多位曾參與蔣王論戰。²³ 另外，他嘗試透過經革會，將學界及產業界的聲音納入政府決策過程，也是當時創舉 (ibid: 430)。

為何俞國華在重大決策時要廣納學界、產業界聲音？為何此時所有人對更徹底的自由化都有共識？王昭明 (1995: 203) 說「廣為徵詢他人意見」是他的決策風格；但其實面對中美貿易爭端愈顯沈重的壓力，俞想要尋找一個拆解危機引信的務實行動策略，或許才是經濟學者及產業界的政策影響力增加的真正原因。而這時強國派已經轉變心意，跟新古典經濟學者一道鼓吹更全面的自由化方案。要理解轉變的原因，需要檢視 1980 年代初，貨幣主義理念「接受脈絡」的結構特徵產生了什麼樣顯著的變化。

(一) 貨幣主義理念的「接受脈絡」

1980 年代初，一連串內、外政治經濟衝擊事實上更加速國際化、自由化步調。首先，1980 年代鉅額出超危機與 1970 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相比，嚴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語。1973-74 以及 1978-79 年雖然都造成國際收支小幅虧損，可是皆未損及出口，外匯依舊大量累積 (Roemer and Chou 2001)；但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出超金額日益擴大及美方壓力倍增，危機感也日益迫切。臺灣財經政策原本具有重商主義傾向，視出超與儲蓄為國家富強的根本，如今兩者積累過度反成病因所在，共同構成了強國派及官邸派政策典範難以處理的異例。

其次，在強烈危機感之下，強國派、官邸派政策典範也試圖在政策工具層次上吸納對手主張，採取更大幅度改革以面對異例。1979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就像 1970 年代初期那樣，產

23 王作榮、陳昭南、陸民仁直接參與了辯論，屬於同一陣營；而于宗先當時為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乃蔣碩傑的副手，屬於新古典經濟學者的陣營。

業政策再次調整。1980年孫運璿內閣上台，放棄擴張石化業的政策性構想，強調低耗能、低污染、技術密集的新方向，如工具機、半導體、電腦及通訊設備、汽車等等（Wade 1990: 97-98）。但與先前不同的是，國際化與自由化此時已成為達成新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如趙耀東推動大汽車廠案，目標仍然是「加速工業升級」，但方法已變，不再是關稅保護與進口替代，而是與日本豐田公司合資，「臺灣的經濟必須完全自由，大門洞開，讓外國人能夠投資，然後把我們的產品外銷世界各國或回銷本國，這是臺灣經濟升級的唯一辦法。」（對臺灣大學及東海大學學生的演講，轉引自邢慕寰 1993：19；同時參見趙耀東 1983；Arnold 1989）王作榮的多篇社論文章也一改過往的保留，認為「應該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來推動自由化與國際化」（王作榮 1996a[1984]；1996b[1984]）。趙耀東、王作榮等人的論述大轉變，是想要在不改變發展型國家的價值與目標之下，純粹將新自由主義當作有效解決問題的行動劇碼而加以挪用；用 Kuhn 的話來說，就是一個科學典範在面臨無法恰當解釋的異例時，可以透過「特例」（ad hoc）方式吸納其他典範的理論來修補其缺陷，而不更動原先的預設及核心範例。就此而言，他們與新古典經濟學者其實是同床異夢：喊的同樣是「全面自由化」口號，但其蘊義（implication）完全不同。強國派擁抱自由化的目的不外乎在變局中嘗試控制局勢，動機是不落入競爭的下風。弔詭的是，此舉卻無異默認了「蔣王論戰」中，新古典經濟學者對於「國家」、「市場」等範疇的重新定義以及危機因果連結有道理，讓一般大眾更容易接受市場教條，進而讓新古典經濟學者更容易擴大政策影響力，新自由主義進一步擴張。

第三，在此新制度環境之下，貨幣主義理念特別針對鉅額出超及超額儲蓄兩個難題，展現了新的「經濟可行性」。此兩者皆是貨幣過剩無法消化的現象，貨幣主義理念透過自律市場概

念，解釋此一過剩乃是政府干預以及市場機制扭曲失效的結果，對危機賦予了簡單有力的解釋；而愈簡單、清晰的解釋往往愈具有吸引力。此外，在新環境下，貨幣主義理念比起強國派或官邸派政策典範，也展現更高的一致性（consistency）與連貫性（coherence）。例如從1970年代末期美國要求開放市場的壓力就逐漸增強，朝自由化方向改變已不可避免，連強國派官僚也高唱自由化與國際化。那麼，先前一再指出該方向的經濟學者就更顯得有先見之明；在亟需改變的危機時刻，他們的理念的激進性格反成優點。

於是，想要採取更全面「自由化」策略以作為解決問題的行動劇碼，也是俞國華做出「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宣示以及召開經革會的動機。所料未及的是，新古典經濟學者透過經革會搶佔更多政策發言權與制定權，而經革會的結論與後續執行，超出了俞國華最初基於實用主義的動機。

第四，貨幣主義理念也展現了「政治可行性」。進入1980年代，市民社會逐漸展現出獨立國家之外的自主力量，這與1970年代的社會力完全不同（李丁讚 2010）。根據陶涵（Jay Taylor）對於蔣經國鉅細彌遺的傳記研究，蔣經國晚年縈繞心頭的二件大事，一是後蔣經國時代國民黨如何延續政權，一是兩岸如何以某種可行的政治架構逐漸結合（陶涵 2000：414, 426）。最終這兩件事會歸結在一起，因為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中國大陸人權運動勃興，而國民黨保守派也愈來愈難以反對島內同樣的籲求；如何駕馭民主的歷史浪潮，成為同時解決這二件事的關鍵（ibid: 447）。當1986年9月，黨外領袖宣布組織民進黨時，蔣經國說了「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的話。從蔣經國的角度看，經濟自由化是更大的政治自由化計畫的一部分，以駕馭並主導時代變局的方向。於是，1987年10月李煥公開宣布，國民黨的政策不再是尋求取代中國共產黨，而是推動「政治改革、言論

自由和經濟自由化」(陶涵 2000: 465)。隔一個月，蔣經國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

蔣碩傑等人的激進自由化路線，在政治上保守，卻在經濟上符合要求改革開放的社會氛圍與期待，正迎合蔣經國的需要，提高了它們進入政治體制的機會。事實上，在此時，他們的主張對朝野都有吸引力，不同政治立場在其中都能得到迴響。蔣碩傑等人呈現的「國家觀」與長久以來潛伏在民間社會內批判黨國體制的聲音，頗有相互呼應之處。雖然六院士身為總統的經濟顧問與政治反對運動毫無瓜葛，但從《自由中國》、黨外雜誌一直到民進黨時期，都存在著尊崇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自由經濟學者的活躍身影，如夏道平、林鐘雄等。夏道平是《自由中國》社論的主要寫手，總共約有四分之一的社論出自其手。他是海耶克思想引入臺灣的最主要推手之一，畢生主張「經濟平等與個人自由是不能相容的，即令是緩和的經濟平等也會傷害個人自由」(夏道平 1995: 164)。他也極為推崇蔣碩傑：「在我國經濟學界，追隨海耶克從理論上不斷抨擊凱因斯學派的，只有蔣先生一人，而且蔣先生還把反凱因斯的經濟理論應用到經濟政策的建議中……那些建議在當時是『極機密』不為大家所知的。」(ibid: 174-175)²⁴

林鐘雄跟夏道平一樣推崇海耶克，也推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他更是新古典經濟學者與民進黨之間的一座重要橋樑。他在《大學》雜誌、《八十年代》與其他黨外雜誌撰稿，扮演民進黨智庫的重要智囊角色，如與康寧祥等人創辦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也是臺灣智庫首任董事長。他的學生彭百顯、陳師孟對民進黨的政策思維與主張影響甚深。他也附和蔣碩傑關於匯率、利率自由化的主張，1982年時受財政部長徐立德之邀，成

24 關於夏道平的行誼與事蹟，參見吳惠林(2009)。

立金融研究小組，參與金融自由化政策之擬定。在陳水扁當總統時，擔任國政顧問團成員及臺灣證交所董事長。《今周刊》稱其：「誰說民進黨沒有財經人才，如果林鐘雄登高一呼，學生人脈牽一牽，準會像粽子一樣，將臺灣的財經人士全部鉤成一大串兒」（劉德宜、黃琴雅 2005）。²⁵ 夏、林二人是新古典經濟思維進入黨外／民進黨的橋樑，教育並形塑民進黨人的經濟觀點。

以上說明了新古典經濟學者的理念在 1985 年成為官方政策的有利條件。然而，也存在著不利的因素，讓自由化政策在往後兩年間踟躕不前。這是因為落實這些理念缺乏「行政可行性」（administrative viability），亦即落實理念所需要的官僚機構及其行政能力。在財經官僚機構的訓練、做事方式及世界觀未有大幅變動的情形下，實際執行面必然陷入既有益糾葛與繁瑣的行政、法規與制度的要求與限制之中，成為停滯不前的藉口。這反映在經建會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所做的檢討報告中，其中它指責多重進口管制形式（作為隱形進口障礙）仍持續存在，經濟部無決心廢除（陳文郎 1987：7）；而公營銀行受到預算、決算、會計、審計、人事及組織等法令束縛，是金融改革中最難突破的一環（楊雅惠 1987：5）。於是，趙耀東對於經革會辛苦研究出來的改革方案無法強制各行政部門遵照實施，感到很洩氣（王昭明 1995：199）。但隨著更多經濟學家進入政府各部會，隨著經建會成為他們的大本營，行政障礙也逐漸降低。

（二）理念的作用：政策變動的「可能性條件」

以上分析，是 1985 年從貿易、金融、投資、再到國營事業民營化等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宣示的背景。要強調的是，此處並不是主張「因為新古典經濟學者的理念獲執政者採納，所以導致

25 關於林鐘雄的行誼、事蹟以及完整著作目錄，參見彭百顯（2011）。

一系列自由化措施實行」這樣單線的因果關係。蔣經國及其財經官僚採納自由化改革的動機非常複雜，經濟環境巨變、舊政策典範逐漸失效、政權延續危機、立竿見影改革的壓力、避免貿易報復、派系角力、個人影響力等偶然、機遇因素都發揮了一定作用，聚合在歷史局勢（conjuncture）之下多重決定（over-determine）了系列自由化政策之浮現。相反地，此處的主要論證是：如果沒有新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與價值革命，我們將很難想像本文開頭一系列完整的自由化政策會被提出，遑論實行；換句話說，前者是後者的可能性條件（condition of possibility）。這些自由化政策內建了一套強制性的觀看事物的詮釋框架（也就是新自由主義政策典範），訴說著一套秩序與效率觀（總是來自沒有干預的市場），以及提供對當前危機的因果解釋（總是來自國家干預）。正是這些特質，使政策具有系統性與內在關聯性，也就是「全面」自由化的由來。正是政策典範內蘊的價值與世界觀，使自由化成為新自由主義化，並且即便遭遇抵抗、反挫、停頓，只要在適當時機以及遇見適當人選，也可能突然復活並激進化，甚至開拓出新的領域，如大型公共建設的 BOT、土地徵收與金融化操作（蔡侑霖 2017）、自負其責的新自由主義主體／欠債者（吳宗昇 2017）。但是在實踐上，政策總是有可能與其意識型態脫鉤（decoupling），或被選擇性挪用並與其他的政策目標與意識型態組裝（assemblage），從而呈現多樣而動態的發展（Hall and Lamont 2013）。

於是，強調政策背後的理念因素，與政治經濟學者「政商結盟」說並不衝突，反而補充解釋了後者之所以可能的正當性基礎。此外，將理念與利益視為一個相互糾結的複合概念（Blyth 2002: 30），有助於更細緻理解資本家的利益計算與行動邏輯如何發展，以及政商結盟關係如何在動態中形成，王永慶即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個案。

(三) 王永慶為何支持自由化？

政治經濟學者通常不會質疑，市場開放與私有化符合財團利益，故政府方能透過釋出經濟租交換政治支持。但利益倘若不是事先給定且永恆不變，這就必須預設自由化的制度轉型具有穩定性、可預測性與正當性，如此財團才能計算行動的利益與風險，並決定是否參與。這些條件在1985年王永慶參與經革會時都不存在。不僅全面自由化尚未發生，甚至早幾年試行的貿易自由化，因碰到石化業的既得利益也大打折扣，例如1983年9月解除五百餘項貨品進口管制的清單中包含了石化原料，卻碰到產銷協議以及須工業局同意，而無法達成預期效益（郭海培1984）。

但是王仍出席經革會擔任產業組召集人（薛琦是副召集人），以產業代表身分大聲疾呼「自由化」與「公平競爭」，甚至出版《革心，革新》一書猛烈抨擊產銷協議，責備中間原料廠處請求保護，並呼籲撤除所有保護（王永慶1985：9）。

王永慶的行動不能以「壓迫政府開放上游輕油裂解產業」為由輕易解釋（王振寰1996：95）。因為王早在1970年代便一直爭取進入這塊中油獨佔的市場而未果，當時沒有、也不可能使用自由化說詞。這裡的關鍵是如何找到具正當性的利益「表述」。王永慶的說詞是：政府有意扶植石化業，但乙烯產量不夠，讓民間來承擔一小部分（王永慶1997：137），這是典型的強國派政策典範邏輯。

王是既有產銷秩序既得利益的受益者，同時也是破壞者與挑戰者，例如台塑1984年5月生產高密度聚乙烯（HDPE）首度上市，價格之低廉震撼整個業界，根本不需要產銷協議限制石化原料進口，並強迫下游以高於國際價格自國內採購原料。台塑的價格破壞之舉讓塑膠加工業者強烈批評工業局，認為產銷秩序是犧

牲加工廠的騙局（李紀台 1984）。倘若整個政府苦心經營的上、中、下游產銷秩序瓦解，改為自由競爭，自然對王永慶有利；他的利益根植在節省成本能力以及業界的領導地位，卻也部分與產銷協議相連（需要上游原料降價及擴產）。如果反對產銷協議，等於跟所有中游同業和政府為敵。一面是體制下的穩定利益，另一面是顛覆體制後可預見、但有風險的新利益，如何衡量新、舊利益以及合理的行動策略，需要更脈絡化的理解。

最終改變王永慶的利益與行動之外在條件，是國際石化產品價格劇烈變動，導致產銷協議本身逐漸難以維持，不僅一年或一季談出來的價格無法反映國際價格變動，使中游持續獲利（王振寰 1995：21）；同時當國際行情大跌時，中游又不斷賠本，工業局斡旋不但無效，自身反成箭靶（經濟日報 1985）。國貿局也建議取消產銷協議，又跟工業局槓上（李紀台、陳介平 1984）。這些外在條件變化讓所有人都對既有產業秩序怨聲載道，降低了王永慶挑戰體制的行動成本。

新古典經濟學者在經革會提供的，正是一個王永慶可以正當表述利益並採取行動的「因果故事」（causal stories）或行動劇碼，將危機的成因、發展及責任歸屬，聯繫到應然的行動路徑與解決方案（Stone 1989），將個人利益包裝成普遍利益。危機是政府不當的保護與補貼，解決方案是開放石化原料進口「加上」開放上游市場。於是，王永慶的企業利益便與自由化藍圖接榫，與新古典經濟學者在經革會中共推自由化大業。理念成為兩方政治結盟的黏著劑，王永慶不必重新創造整套說詞，新古典經濟學者十餘年來的宣教內容已經廣為傳誦，他只要利用既有理念轉譯其利益即可。的確，《革心，革新》一書跟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說詞毫無差別。

八、政策鞏固期：典範革命或交疊？

自由化政策全面啟動，但與 Hall (1993) 的模型預測相反，新典範取代舊典範的情形卻沒有發生。在 1987 年以後的政策鞏固期，實施步驟仍是漸進審慎，國家的再管制手段並未消退。例如金融自由化政策對於金融與貨幣穩定的高優先目標並無改變 (Thurbon 2001)，資本市場國際化的開放時程與步驟長達 20 年，且刻意修改《外匯管理條例》，強化中央銀行干預金融市場、吸收國際金融震盪的能力 (李存修、葉銀華 2014)。經濟部工業局也繼續維持新重商主義的政策路線，如 1990 年推出「產業升級條例」。

從官僚系統的人事組成來看，發展型國家傳統在短期內仍然存續。李登輝時期的財經官僚是由與李登輝友好的「台大幫」以及李國鼎門生所形成的「K.T. 派」兩個系統構成 (王振寰 1996: 125; 李津通 1985)。後者仍是強國派的一支，新上台的「台大幫」雖然認同自由化，但他們也認同金融穩定及工業發展，如央行前後任總裁謝森中與許遠東以及財政部長邱正雄 (Thurbon 2001: 254-255)。換句話說，發展型國家的主要官僚機構，如財政部、央行及經濟部的政策傳統及執行能力並沒有因自由化轉型而大幅更動。

為何典範革命沒有發生？國民黨過去的經濟實績不錯，經濟危機未造成政黨輪替是主因，舊發展官僚仍實際負責推動自由化政策。其次，基於兩岸敵對關係，政府也一直防範金融開放過於躁進，以免影響國家安全 (Dent 2003: 469)。

從政策典範的內在特徵來看，或許更重要的因素是，新自由主義作為政策典範，具有烏托邦性質，政策宣稱與實際作為經常不一致 (Polanyi 2001[1944])。在政策宣稱上，它要求立即、全

面地讓「市場機能」恢復運作，然而實際上卻不得不陷入或處理各種市場鑲嵌關係。於是在政策鞏固階段，「全面」自由化受到現實環境或執行面技術限制之下，不得不做出妥協，結果往往是又回到「審慎」自由化路線，國營事業私有化正是一例（張晉芬 2002：93-99），整個過程延宕，呈現時斷時續的狀態（McBeath 1997）。

這表面上似乎印證了發展型國家轉型論的判斷。轉型論者主張，國家的管制仍能主導經濟方向與步調。此一宣稱明顯忽視了許多重要變化。首先，從 198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中期的十年之間，臺灣經濟制度環境已大幅自由化、開放與國際化。任何強調發展的官僚都不會否認，自由化趨勢還會繼續下去，雖然國家仍在嘗試介入某些特定領域帶領發展，但是否有能力主導，是一個不確定的變數，成效如何需要個案深入認定（王振寰 2010）。

其次，轉型論忽略了，國家機器本身也在新自由主義化。1987 年以後，新古典經濟學者取得了更多進入政府機構制定政策的機會，經建會已成新古典經濟學者從政大本營（Wade 1990: 204, 220），於是也賦予新自由主義持續發展的潛力並逐漸提升「行政可行性」。如 1995 年推出的「亞太營運中心」曾被當時經建會副主委薛琦稱讚為「全盤自由化計畫的突破性思考」（Schive 1999: 46），該構想後來受阻於兩岸關係低盪無法執行。但自 2000 年政黨輪替以後，相同構想其實都在藍、綠政府中以不同政策語言包裝而借屍還魂，例如陳水扁政府改成「全球運籌中心」、馬英九政府提出「自由經濟示範區」。同一批信奉新古典經濟學的學者橫跨藍、綠政黨提供政策規劃與建言，甚至可以追溯至 1990 年代早期。1991 年民進黨中央黨部和立院黨團主辦了「全國民間經濟會議」，年輕一輩的經濟學者如張清溪、施俊吉、陳師孟、陳博志、許嘉棟、朱雲鵬、陳添枝等穿梭其間（許陽明 1991）；陳添枝甚至能從馬英九時期的經建會主委橫跨至蔡英文

政府擔任國發會主委。

另外，2001年起的政府改造運動帶來政府職能的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及去任務化，讓市場機制進入政府政策的實際執行與運作（黃應貴 2014：13）；政府仍在對經濟運作做出諸多管制與協調措施，不過目標變成強化市場的運作與效能，如近年來引入新會計準則重新打造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夏傳位 2017）。

從典範競逐的角度，臺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典範並未革命成功，而是與發展型國家交疊（layering）在一起。這個詞指涉兩種迥異的制度原則並存在同一個體系之中，使體系內部缺乏連貫並呈現脫節、拼裝的發展，變遷來自於其中一個擴張得比另一個快，讓後者逐漸萎縮（Streeck and Thelen 2005: 22-24）。在 1980 年代末期，也逐漸形成「發展型國家轉型」及「新自由主義擴張」齊頭並進、相互競爭的現象。

不過，交疊的兩種制度原則未必如 Streeck 與 Thelen 所設想，必然是涇渭分明。學界過去傾向將「新自由主義」與「發展型國家」當作兩種互斥的理念型，而發展型國家論在強調國家領導經濟角色、並反駁市場機制是最佳發展策略時，過度將「國家」與「市場」兩個範疇對立，也強化了此一傾向。然而，臺灣的歷史經驗卻非如此。首先，臺灣的發展官僚其實從不反對市場，²⁶ 他們只是採取李國鼎所謂的「實用主義」態度來小心翼翼擁抱市場；其次，新古典經濟學者比起英、美的同類更注重出口、也更發展主義取向；第三，新古典經濟學者一向扮演政府的經濟

26 如前文述及央行總裁俞國華在演講中為貨幣市場改革政策辯護時，首先對貨幣主義的真理聲稱致敬。另外，尹仲容在 1954 年回覆工商業界、民意代表、經濟學者要求放鬆外匯管制的呼聲時，也說：「自由政策是好人，管制政策是病人」，意謂管制是非常時期不得不做的做法，未來是要逐步邁向自由化的（沈雲龍編 1988：181）；第三個例子是狄英（1981）紀錄了趙耀東與傅利曼就國家管制角色的唇槍舌戰。趙說：「我是支持你的人，在理論上我百分之百的同意你的看法，但做起來你得給一段時間……」。從這幾個例子看，臺灣發展型國家傳統就「價值與方向」一向不反對市場至上觀，只是認為開放需要時間適應。

顧問，跟威權政府維持良好關係。這讓他們在思考解決問題時，依賴國家能動（agency）之程度超乎自己的想像；第四，兩者之間也都重視經濟發展及資本積累甚於其他價值，因而兩者也從不反對商品化。第五，臺灣另一些重大的結構變遷趨勢，如民主化轉型帶來對社會安全、經濟平等與環境保護的要求，以及建立新國家對於生命共同體的想像，透過政治競爭，也要求檢討發展主義，制約新自由主義擴張。

若「發展型國家」與「新自由主義」不是互斥的理念型，而是在同一個制度體系中迥異卻可以並存的制度原則，彼此鬆散地連結而非形成功能性整體；那麼就可能出現不同採借與混雜的策略。這尤其是考慮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挑戰：當個別民族國家一方面必須在全球化與金融化的外在環境壓力之下努力融入、適應以尋找生存之道，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動盪及再管制的要求也無法迴避時，國家介入與市場運作之間不再有明顯的界線：國家介入是為了確保市場能正常運作，而非干預市場；而市場邏輯也成為國家介入與滿足發展慾望的憑藉，甚至是社會自我組織的原則。

於是，臺灣發展型國家確實經歷了新自由主義轉型，卻不是英、美典型的新自由主義，千禧年前後的臺灣逐漸演化出一種中間混雜的策略，或可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發展主義」（neoliberal developmentalism），個別政策對於新自由主義或發展主義的相對強調容有不同，但都是挪用了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典範或工具，以期達成經濟發展的目標。

九、結論

新自由主義為何能在發展型國家傳統的臺灣生根茁壯？本文

的回答是：即便在發展型國家鼎盛時期，經濟官僚內部仍存在著多元競逐的政策典範及派系。新古典經濟學者利用重大危機提供的機會，推銷新自由主義理念以追逐政策權力。我們可以從兩方面看新自由主義的成就：其一是作為一種描述與規範國家／市場關係的意義系統和認知方式，如惡棍國家觀、市場效率觀以及危機因果連結，始於「蔣王論戰」而藉著媒體效應而不斷向外擴散，從有爭議的意識型態逐漸轉變成如常識般的文化霸權。其二是作為政策典範，隨著更多經濟學者在政府經濟部門掌握政策制定權，並不分政黨發揮影響力，而逐步擴張地盤。但兩者的擴張未必相關，甚至可以相互獨立，呈不均衡發展。前者的成就遠比後者大，例如許多民眾遭遇困難時處處要求政府介入解決，卻仍維持政府與國營企業就是無效率的既定認知；作為政策典範的擴張則受到內在烏托邦性質、地緣政治、結構條件、選舉競爭、社會運動的阻礙以及發展型國家傳統的抵制，而呈現拉鋸與妥協。但從1980年代中期至今，新自由主義化呈現漸進卻實質（incremental but substantial）的進展與成果。

為何強國派、官邸派官僚要接受新自由主義？本文的答案是：到了1980年代初，基於李國鼎所謂「實用主義」的審慎自由化路線已逐漸捉襟見肘，不論俞國華、趙耀東或王作榮都轉向更全面自由化路線，但僅限於將新自由主義當作有效解決問題的行動劇碼而加以挪用，不涉及價值與世界觀的改變。但終究將新自由主義作為行動劇碼與其核心概念（認知預設、範疇與因果敘事）分開，是一個失敗的策略。俞國華等財經官僚需要向外挪用政策工具此一事實，即是肯定新自由主義的效用，難以辯駁後者的真理聲稱，亦顯示發展型國家的價值與目標愈來愈與行動脫節，失去現實感。

於是，1985年經革會各方雖團結在「自由化、國際化、制度化」口號下，事實上卻是各有盤算、同床異夢。新自由主義化

是各種歷史因緣匯聚的結果，非任何單一因素所能決定，但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觀念與價值革命卻是其「可能性條件」。既然新自由主義的完整套餐成為既定政策，即便在短期只是宣示，長期而言只要在適當時機以及遇見適當人選，都可能突然啟動並激進化，甚至開拓出新疆界。

政治經濟學觀點的主要分析案例集中在1988年以後，無法解釋蔣經國晚期尚不需要依賴政商結盟來維繫政權，自由化政策便已發軔一事。其次，政治經濟學預設新自由主義的吸引力，卻未解釋其過程。本文指出，新古典經濟學者自1970年代的長期推動，才是激進自由化路線在關鍵時刻能夠成為執政者選項、並擴大社會影響力的真正原因。由於發展型國家視角長期低估了新古典經濟學者的影響力，造成以上兩個問題無法有效回答。另外，本文將理念與利益視為一個相互糾結的複合概念，並分析王永慶的利益計算與行動邏輯，矯正了政治經濟學將理念與利益分離處理的缺陷。

發展型國家轉型論正確指出，新自由主義在臺灣的發展受到歷史、結構、國際地緣政治等制約，舊政策傳統並未完全死去，甚至永遠不會死去，因為經濟事務總是需要國家的介入協調（Block 2003）。但轉型論者強調發展型國家的強韌，卻忽略改變幅度之劇烈。歸根結底，這與「發展型國家」仍被視為是一個制度相互協調的功能性整體的信念有關，在一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世界裡，此一假設已難以成立。本文提出制度「交疊」的說法，或許是一個更適宜捕捉當前複雜處境的概念。

本文聚焦在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角色，也帶出另一層因果關係：六院士在蔣王辯論中的利益為何？我們可以看到經革會中經濟學者與王永慶的合作讓後者終於能進軍石化業上游。但在蔣王辯論中，蔣碩傑的升息主張卻不利於大企業。六院士的形象毋寧

接近 Mannheim (1991) 描述的「超然知識份子」(free-floating intellectual)，他們的用意單純在於打破銀行特權壟斷與不當管制。對他們重要的不是「物質利益」(material interest)，而是 Weber (1958: 280) 所說的「精神利益」(ideal interest)。

六院士的精神與物質利益要放在跨國學術—政策場域所界定的權力及聲望中才看得清。以蔣碩傑為例，他在這兩個領域中都有相當影響力，既曾在 IMF 工作，也是羅徹斯特 (Rochester) 大學及康乃爾 (Cornell) 大學的教授。1960 年代新古典經濟學與凱因斯主義爭奪學術霸權時，除了爭執於西方經驗的教訓，相當程度也「決戰海外」，爭奪如何解讀臺灣這樣特殊成功的故事。於是，臺灣很早便進入新自由主義的學術—政策網絡，成為後者建立全球真理體制的一個重要參照點。如高速成長的亞洲四小虎在 1980 年代持續被國際組織拿來與拉丁美洲國家的停滯作對比，證明對外開放、市場與貿易的重要性 (Centeno and Cohen 2012: 329)；蔣碩傑也曾自豪地告訴口述歷史訪問者，當許多國家向 IMF 及世界銀行借錢時，都被要求仿效臺灣的辦法，也就是採行新自由主義政策處方 (陳慈玉、莫寄平 1992: 116)。臺灣新古典經濟學者在東亞的網絡節點協助鞏固此一全球真理體制，並從中獲取巨大的聲望及權力。

這層學術與政治交替掩護的權力關係，也是新自由主義很重要的面向 (較著名的研究參見 Fourcade-Gourinchas 2006)。本文藉著強調新古典經濟學者的歷史作用，也隱含著反省臺灣人文社會研究當中潛在的新自由主義影響。首先，既有文獻都將經濟自由化的起點訂在 1985 年前後，亦即絕大多數學者都接受了新古典經濟學者對於「自由化」的定義，只有當他們的方向及議程擺上檯面，才算是自由化的起始。其次，政治經濟學觀點不論是站在支持抑或批判自由化的立場，對於國家經濟角色的認定與分析，都可以追溯至蔣王辯論中率先實驗的方法與觀點，亦即將國

家的經濟干預視為各種壟斷與剝削的源頭。若我們對早期臺灣經濟發展官僚的世界觀稍有理解，如本文開頭引述尹仲容的話，就不難發現此種國家觀並非自始就存在，是晚近的建構。

於是，我們看到新古典經濟學者的危機理論能夠滲透深入人文社會論述的核心預設，翻轉「市場」與「國家」的定義，並透過科學真理的權威重構知識。一旦廣泛的知識領域，甚至包括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不自覺地以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聲稱為前提，那麼這將有助於正當化一套新自由主義的理性秩序與行為規範，而後者又帶有政治與經濟資源重分配的意涵。

作者簡介

夏傳位

研究興趣為台灣資本主義體制的歷史形成及其變遷，特別聚焦在新自由主義轉型的相關經驗、論述與實踐上。著作有〈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會計作為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渠道〉、〈新自由主義是什麼？三種理論觀點的比較研究〉、〈金融化故事及其測量〉。目前研究課題為追溯1950年代台灣經濟政策中的「市場」概念與新古典經濟學者的角色；另外一個研究方向則是從事屏東縣鄉村的社會、文化與經濟調查，從地方層次觀察新自由主義的效應。

參考書目

工商時報，1982，《財經政策大辯論：臺灣經濟問題與對策討論會實錄》。臺北市：時報文化。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1982,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Tai Wan Jing Ji Wun Ti Yu Duei Tse Tao Lun Huei Shih Lu.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尹仲容，1957，〈改善經濟現狀之基本途徑〉。頁84-87，收錄於尹仲容著，《我對臺灣經濟的看法全集續編》。臺北市：美援運用委員會。

(Yin, Jhong-Rong, 1957, Gai Shan Jing Ji Sian Jhuang Jhieh Ji Ben Tu Jing, Pp. 84-87 in Wo Duei Tai Wan Jing Ji De Kan Fa Chyuan Ji Syu Bian, edited by Yin Jhong-Rong. Taipei: Mei Yuan Yun Yong Wei Yuan Huei [Council for U.S. Aid].)

尹仲容，1960，〈論經濟發展：兼論香港與波多黎各經濟進步的原因〉。頁169-183，收錄於尹仲容著，《我對臺灣經濟的看法全集續編》。臺北：美援運用委員會。

(Yin, Jhong-Rong, 1960, Lun Jing Ji Fa Jhan: Jian Lun Siang Gang Yu Po Duo Li Ge Jing Ji Jin Bu De Yuan Yin. Pp. 169-183 in Wo Duei Tai Wan Jing Ji De Kan Fa Chyuan Ji Syu Bian, edited by Yin Jhong-Rong. Taipei: Mei Yuan Yun Yong Wei Yuan Huei [Council for U.S. Aid].)

王永慶，1985，《革心，革新：王永慶對經濟革新委員會之建言》。臺北市：經濟日報。

(Wang, Yong-Ching, 1985, Ge Sin, Ge Sin: Wang Yong Ching Duei Jing Ji Ge Sin Wei Yuan Huei Jhieh Jian Yan. Taipei: Jing Ji Rih Bao [Economic Daily News].)

王永慶，1997，《臺灣活水：市場經濟與社會力量》。臺北市：臺灣日報社。

(Wang, Yong-Ching, 1997, Tai Wan Huo Shuei: Shih Chang Jing Ji Yu She Huei Li Liang. Taipei: Tai Wan Rih Bao She [Taiwan Daily].)

王作榮，1982a [1981]，〈敬答蔣碩傑先生〉。頁46-59，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Wang, Zuo-Rong, 1982a [1981], Jing Da Jiang Shuo Jieh Sian Sheng,

Pp. 46-59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王作榮，1982b [1981]，〈短期波動不必在意，長期發展至關重要〉。頁 150-152，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Wang, Zuo-Rong, 1982b [1981], Duan Chi Po Dong Bu Bi Zai Yi, Chang Chi Fa Jhan Jhih Guan Jhong Yao, Pp. 150-142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王作榮，1996a[1984]，〈應該用整個政府的力量來推動自由化與國際化〉。頁 231-233，收錄於王作榮著，《不完整的奇蹟：經濟革新與經濟自由化》。臺北市：時報文化。

(Wang, Zuo-Rong, 1996a [1984], Ying Gai Yong Jheng Ge Jheng Fu De Li Liang Lai Tuei Dong Zih You Hua Yu Guo Ji Hua. Pp. 231-233 in Bu Wan Jheng De Chi Ji: Jing Ji Ge Sin Yu Jing Ji Zih You Hua, authored by Wang Zuo-Rong.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王作榮，1996b[1984]，〈經濟應自由化與國際化——因為我們別無選擇〉。頁 238-248，收錄於王作榮著，《不完整的奇蹟：經濟革新與經濟自由化》。臺北市：時報文化。

(Wang, Zuo-Rong, 1996b [1984], Jing Ji Ying Zih You Hua Yu Guo Ji Hua — Yin Wei Wo Men Bieh Wu Syuan Ze. Pp. 238-248 in Bu Wan Jheng De Chi Ji: Jing Ji Ge Sin Yu Jing Ji Zih You Hua, authored by Wang Zuo-Rong.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王昭明，1995，《王昭明回憶錄》。臺北市：時報文化。

(Wang, Jhao-Ming, 1995, Wang Jhao Ming Huei Yi Lu.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王振寰，1995，〈國家機器與石化業的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8: 1-37。DOI: 10.29816/TARQSS.199502.0001

(Wang, Jenn-Hwan, 1995, Guo Jia Ji Chi Yu Shih Hua Yeh De Fa Jhan [The Stat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Petrochemical

- Industry]. Tai Wan She Hue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18: 1-37.)
- 王振寰，1996，《誰統治臺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臺北市：巨流。
- (Wang, Jenn-Hwan, 1996, Shei Tong Jhih Tai Wan? Jhuan Sing Jhong De Guo Jia Ji Chi Yu Chyuan Li Jieh Gou. Taipei: Chiuliu.)
- 王振寰，2010，《追趕的極限：臺灣的經濟轉型與創新》。臺北市：巨流。
- (Wang, Jenn-Hwan, 2010, Juei Gan De Ji Shian: Tai Wan De Jing Ji Juan Shing Yu Chuang Shin [The Limits of Fast Follower: Taiwan'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novation]. Taipei: Chiuliu.)
- 王耀興，1981，〈十年來調整銀行利率之動機與時機之檢討〉。《台北市銀行月刊》12(4): 1-34。
- (Wang, Yao-Sing, 1981, Shih Nian Lai Tiao Jheng Yin Hang Li Lyu Jhih Dong Ji Yu Shih Ji Jhih Jian Tao, Tai Bei Shih Yin Hang Yueh Kan [Taipei Bank Monthly Journal.] 12(4): 1-34.)
- 文現深，1984，〈經建會重用諮詢委員〉。《天下雜誌》第43期，12月1日。
- (Wun, Sian-Shen, 1984, Jing Jian Huei Jhong Yong Zih Syun Wei Yuan. Tian Sia Za Jhih [CommonWealth Magazine] 43, December 1st.)
- 許陽明，1991，《全國民間經濟會議實錄》，共三冊。臺北市：民進黨中央黨部。
- (Syu, Yang-Ming, 1991, Chyuan Guo Min Jian Huei Yi Shih Lu, Taipei: Min Jin Dang Jhong Yang Dang Bu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 朱雲漢，2000，〈90年代民主轉型期經濟政策制訂的效率與公平性〉。頁1-26，收錄於朱雲漢、包宗和編，《民主轉型與經濟衝突：九〇年代臺灣經濟展的困境與挑戰》。臺北市：桂冠。
- (Chu, Yun-Han, 2000, 90 Nian Dai Min Jhu Jhuan Sing Chi Jing Ji Jheng Tse Jhih Ding De Siao Lyu Yu Gong Ping Sing. Pp. 1-26 in Min Jhu Jhuan Sing Yu Jing Ji Chong Tu: Jiou lin Nian Dai Tai Wan Jing Ji Jhan De Kun Jing Yu Tiao Jhan, edited by Chu Yun-Han and Bau Tzong-Ho. Taipei: Guei Guan [Laureate].)
- 行政院經建會，1984，《歷次財經會談總統指示新聞稿彙編》。

(Sing Jheng Yuan Jing Jian Hu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84, Li Tsih Tsai Jing Huei Tan Zong Tong Jhieh Shih Sin Wun Gao Huei Bian.)

行政院經建會，1987，《中華民國七十六年經濟年報：貿易鉅額出超的衝擊與挑戰》。

(Sing Jheng Yuan Jing Jian Hu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87, Jhong Hua Min Guo Chi Shih Liou Nian Jing Ji Nian Bao: Mao Yi Jyu E Chu Chao De Chong Ji Yu Tiao Jhan.)

行政院經建會，1988，《中華民國七十七年經濟年報：邁向經濟自由化之路》。

(Sing Jheng Yuan Jing Jian Hu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88, Jhong Hua Min Guo Chi Shih Liou Nian Jing Ji Nian Bao: Mai Siang Jing Ji Zih You Hua Jhieh Lu.)

行政院經建會，1991，《公營事業民營化——英國經驗與國際趨勢》。

(Sing Jheng Yuan Jing Jian Hu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Executive Yuan], 1991, Gong Ying Shih Yeh Min Ying Hua — Ying Guo Jing Yan Yu Guo Ji Chyu Shih.)

余慶俊，2009，《臺灣財經技術官僚的人脈與派系1949-1988》。臺北市：政大台史所碩士論文。

(Yu, Ching-Chun, 2009, Tai Wan Tsai Jing Ji Shu Guan Liao De Ren Mai Yu Pai Si 1949-1988. Taipei: Jheng Da Tai Shih Suo Shuo Shih Lun Wun [Master Thesis from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李丁讚，2010，〈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頁313-356，收錄於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臺北市：群學。

(Lii, Ding-Tzann, 2010, Shih Min She Huei Yu Gong Gong Ling Yu. Pp. 313-356 in Di Guo Bian Yuan: Tai Wan Sian Dai Sing De Kao Cha [Peripheries of the Empire: Investigating Taiwanese Modernity], edited by Jin-lin Huang, Horng-Luen Wang and Chung-Hsien Huang Taipei: Chyun Syueh [Socio Publishing].)

李存修、葉銀華，2014，《臺灣資本市場之發展》。臺北市：臺灣金融

研訓院。

(Li, Tsun-Siou and Yin-Hua Yeh, 2014, *Tai Wan Zih Ben Shih Chang Jhih Fa Jhan*. Taipei: Tai Wan Jin Rong Yan Syun Yuan [Taiwan Academy of Banking and Finance].)

李津通，1985，〈臺灣金融主流派——台大經濟系畢業生〉。《財訊》40: 140-143。

(Li, Jin-Tong, 1985, *Tai Wan Jin Rong Jhu Liou Pai—Tai Da Jing Ji Si Bi Yeh Sheng*. Tsai Syun [Wealth Magazine] 40: 140-143.)

李紀台，1984，〈台塑 HDPE 風波，驚動業界！〉。經濟日報，第 10 版，5 月 4 日。

(Li, Ji-Tai, 1984, *Tai Su Hdpe Fong Po, Jing Dong Yeh Jieh! Jing Ji Rih Bao* [Economic Daily News], page 10, May 4th.)

李紀台、陳介平，1984，〈石化原料管制進口，衡諸現狀沒啥道理〉。經濟日報，第 3 版，7 月 21 日。

(Li, Ji-Tai and Jieh-Ping Chen, 1984, *Shih Hua Yuan Liao Guan Jhih Jin Kou, Heng Jhu Sian Jhuang Mei Sha Dao Li*. *Jing Ji Rih Bao* [Economic Daily News], Page 3, July 21st.)

李國鼎著、趙建中譯，1993，〈臺灣經濟發展背後的政策演變〉。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

(Li, Guo-Ding, translated by Jian-Jhong Chao, 1993, *Tai Wan Jing Ji Fa Jhan Bei Hou De Jheng Tse Yan Bian*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behind Taiwan's development success.], Jianguo: Dong Nan Chu Ban She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李國鼎口述、劉素芬編著，2005，〈李國鼎：我的臺灣經驗——李國鼎談臺灣財經決策的制定與思考〉。臺北市：遠流。

(Li, Guo-Ding and Su-Fen Liu, 2005, *Li Guo Ding: Wo De Tai Wan Jing Yan—Li Guo Ding Tan Tai Wan Tsai Jing Jyueh Tse De Jhih Ding Yu Sih Kao*. Taipei: Yuan Liou.)

李庸三，1982，〈我國之貨幣市場〉（上）（下）。《貨幣金融月刊》4-5。

(Li, Yong-San, 1982, *Wo Guo Jhih Huo Bi Shih Chang Part 1 & 2*. *Huo Bi Jin Rong Yueh Kan* 4-5.)

李庸三、陳上程，1983，〈臺灣金融政策對工業化之影響〉。頁 593-665，收錄於《臺灣工業發展會議》。臺北市：中研院經濟所。

(Li, Yong-San and Shang-Cheng Chen, 1983, Tai Wan Jin Rong Jheng Tse Dwei Gong Yeh Hua Jhih Ying Siang. Pp. 593-665 in Tai Wan Gong Yeh Fa Jhan Huei Yi. Taipei: Jhong Yan Yuan Jing Ji Suo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沈雲龍，1988，《尹仲容先生年譜初稿》。臺北市：傳記文學。

(Shen, Yun-Long, 1988, Yin Jhong Rong Sian Sheng Nian Pu Chu Gao. Taipei: Jhuan Ji Wun Syueh.)

狄英，1981，〈趙耀東舌戰傅利曼〉。《天下雜誌》，第1期，頁43-47。

(Di, Ying, Jhao Yao Dong She Jhan Fu Li Man. Tian Sia Za Jhih [CommonWealth Magazine] 1: 43-47.)

邢慕寰，1993，《臺灣經濟策論》。台北：三民。

(Xing, Mu-Huan, 1993, Tai Wan Jing Ji Tse Lun. Taipei: San Min.)

阮登發，1982，〈李斯特大戰亞當斯密？〉。頁60-70，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Ruan, Deng-Fa, 1982, Li Sih Te Da Jhan Ya Dang Sih Mi. Pp. 60-70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吳宗昇，2017，〈惡債：卡債、債務人與社會傷害〉。頁117-183，收錄於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臺北市：群學。

(Wu, Chung-Shen, 2017, E Jhai: Ka Jhai, Jhai Wu Ren Yu She Huei Shang Hai. Pp. 117-183 in Jin Rong Jing Ji, Jhu Ti Sing, Yu Sin Jhih Syu De Fu Sian [The Finance Economy, Subjectivity, and the Emerging Order], edited by Ying-Kuei Huang and Weining Cheng. Taipei: Chyun Syueh [Socio Publishing.]

吳迎春，1986，〈台灣有沒有經濟政策〉。《天下雜誌》，第61期，頁12-20。

(Wu, Ying-Chun, 1986, Tai Wan You Mei You Jing Ji Jheng Tse. Tian Sia Za Jhih [CommonWealth Magazine] 61: 12-20.)

吳泉源，1993，〈金融自由化的迷思：一個經濟社會學的考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5: 1-37。

(Wu, Chyuan-Yuen, 1993, Jin Rong Zih You Hua De Mi Sih: Yi Ge Jing Ji

- She Huei Syueh De Kao Cha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Reconsidered: A Critique from Economic Sociology]. Tai Wan She Hue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15: 1-37.)
- 吳惠林，2009，〈在金融風暴肆虐中緬懷夏道平先生——兼論自由經濟、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永豐金融季刊》46: 1-35。
- (Wu, Huei-Lin, 2009, Zai Jin Rong Fong Bao Sih Nyueh Jhong Mian Huai Sia Dao Ping Sian Sheng—Jian Lun Zih You Jing Ji, Zih You Jhu Yi Yu Ge Ren Jhu Yi. Yong Fong Jin Rong Ji Kan [Sinopac Financial Journal Quarterly] 46: 1-35.)
- 柯飛樂，1982，〈利率運用可高可低，貨幣供給應具彈性〉。頁155-157，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 (Ke, Fei-Le, 1982, Li Lyu Yun Yong Ke Gao Ke Di, Huo Bi Gong Ji Ying Jyu Tan Sing. Pp. 155-157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俞國華，1982，〈如何推動利率自由化〉。《中央銀行季刊》4(2): 7-18。
- (Yu, Guo-Hua, 1982, Ru He Tuei Dong Li Lyu Zih You Hua. Jhong Yang Yin Hang Ji Kan 4(2): 7-18.)
- 俞國華口述，王駿執筆，1999，〈財經巨擘：俞國華生涯行腳〉。臺北市：商智文化。
- (Yu, Guo-Hua and Jyun Wang, 1999, Tsai Jing Jyu Bo: Yu Guo Hua Sheng Ya Sing Jiao. Taipei: Shang Jhih Wun Hua.)
- 夏道平，1995，〈自由經濟學家的思與言〉。臺北市：遠流。
- (Xia, Dao-Ping, 1995, Zih You Jing Ji Syueh Jia De Sih Yu Yan. Taipei: Yuan Liou.)
- 夏傳位，2017，〈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會計作為金融化的渠道〉。頁75-116，收錄於黃應貴、鄭瑋寧主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
- (Hsia, Chuan-Wei, 2017, Ming Siou Jhan Dao, An Du Chen Tsang: Kuai Ji Zuo Wei Jin Rong Hua De Chyu Dao. Pp. 75-116 in Jin Rong Jing Ji, Jhu Ti Sing, Yu Sin Jhih Syu De Fu Sian [The Finance Economy, Subjectivity, and the Emerging Order], edited by Ying-Kuei Huang and Weining Cheng. Taipei: Chyun Syueh [Socio Publishing.]

- 郭海培，1984，〈三次開放進口措施不理想，貿易自由化猶待努力〉。
《經濟日報》，第3版，3月10日。
(Guo, Hai-Pei, 1984, San Tsih Kai Fang Jin Kou Tsuo Shih Bu Li Siang, Mao Yi Zih You Hua You Dai Nu Li. Jing Ji Rih Bao [Economic Daily News], page 3, March 10th.)
- 陶涵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2000，〈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市：時報文化。
(Tao Han, translated by Tian-Guei Lin, 2000, Tai Wan Sian Dai Hua De Tuei Shou, Jiang Jing Guo Chuan [The Generalissimo's Son :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Taipei: Shih Bao Chu Ban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 張晉芬，2002，〈臺灣公營事業民營化：經濟迷思的批判〉。臺北市：中研院社會所。
(Chang, Chin-Fen, 2002, Tai Wan Gong Ying Shih Yeh Min Ying Hua: Jing Ji Mi Sih De Pi Pan. Taipei: Jhong Yan Yuan She Huei Suo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張鐵志，2008，〈台灣經濟自由化的政治邏輯：黨國資本主義的轉型與新政商聯盟1980-2000〉。《台灣政治學刊》12(1): 101-145。DOI: 10.6683/TPSR.200806.12(1).101-145。
(Chang, Tieh-Chih, 2008, Tai Wan Jing Ji Zih You Hua De Jheng Jhih Luo Ji: Dang Guo Zih Ben Jhu Yi De Jhuan Sing Yu Sin Jheng Shang Lian Mong 1980-2000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in Taiwa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rty-state Capitalism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Tai Wan Jheng Jhih Syueh Kan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2(1): 101-145.)
-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話說臺灣經驗〉。臺北縣：卓越文化。
(Kang, Lyu-Dao, 1993, Li Guo Ding Kou Shu Li Shih: Hua Shuo Tai Wan Jing Yan. Taipei: Jhuo Yueh Wun Hua.)
- 陳文郎，1987，〈造成目前經濟問題之原因與政府應採之因應政策，分項報告（四）：我國進口自由化政策之現狀及其問題〉。臺北市：中華經濟研究院。

- (Chen, Wun-Lang, 1987, Zao Cheng Mu Chian Jing Ji Wun Ti Jhih Yuan Yin Yu Jheng Fu Ying Tsai Jhih Yin Ying Jheng Tse, Fen Siang Bao Gao Part IV: Wo Guo Jin Kou Zih You Hua Jheng Tse Jhih Sian Jhuang Ji Chi Wun Ti. Taipei: Chung Hua Jing Ji Yan Jiou Yu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陳永華，1981，〈臺灣貨幣市場之發展與展望〉。《臺灣經濟金融月刊》17(8): 14-28。
- (Chen, Yong-Hua, 1981, Tai Wan Huo Bi Shih Chang Jhih Fa Jhan Yu Jhan Wang. Tai Wan Jing Ji Jin Rong Yueh Kan 17(8): 14-28.)
- 陳師孟等，1991，《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臺灣官營事業之民營化》。臺北市：自立晚報。
- (Chen, Shih-Mong et al., 1991, Jieh Gou Dang Guo Zih Ben Jhu Yi: Lun Tai Wan Guan Ying Shih Yeh Jhih Min Ying Hua. Taipei: Zih Li Wan Bao.)
- 陳添枝，1999，〈貿易政策的演變〉。頁391-425，收錄於施建生編，《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經濟發展經驗》。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Chen, Tian-Jhih, 1999, Mao Yi Jheng Tse De Yan Bian. Pp. 391-425 in Yi Jiou Ba Ling Nian Dai Yi Lai Tai Wan Jing Ji Fa Jhan Jing Yan. Taipei: Jhong Hua Jing Ji Yan Jiou Yu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陳慈玉、莫寄屏，1992，《蔣碩傑先生訪問紀錄》。臺北市：中研院近史所。
- (Chen, Tsih-Yu and Ji Ping Mo, 1992, Jiang Shuo Jieh Sian Sheng Fang Wun Ji Lu. Taipei: Jhong Yan Yuan Jin Shih Suo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陳聽安、林鐘雄、倪成彬，1983，《實施利率自由化之途徑》。臺北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 (Chen, Ting-An, Jhong Syong Lin and Cheng Bin Ni, 1983, Shih Shih Li Lyu Zih You Hua Jhih Tu Jing. Taipei: Sing Jheng Yuan Yan Jiou Fa Jhan Kao He Wei Yuan Huei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 許嘉棟，1983，〈臺灣之金融體系雙元性與工業發展〉。頁87-114，收錄於《臺灣工業發展會議論文集》。臺北市：中研院經濟所。

(Syu, Jia-Dong, 1983, Tai Wan Jhieh Jin Rong Ti Si Shuang Yuan Sing Yu Gong Yeh Fa Jhan. Pp. 87-114 in Tai Wan Gong Yeh Fa Jhan Huei Yi Lun Wun Ji. Taipei: Jhong Yan Yuan Jing Ji Suo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許嘉棟、梁明義、楊雅惠、劉壽祥、陳銘坤，1985，《臺灣金融體制之研究》。臺北市：中華經濟研究院。

(Syu, Jia-Dong, Ming Yi Liang, Ya Huei Yang, Shou Siang Liou and Ming-Kun Chen, 1985, Tai Wan Jin Rong Ti Jhieh Jhieh Yan Jiou. Taipei: Jhong Hua Jing Ji Yan Jiou Yu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彭光治，2003，《股戲：走過半世紀的臺灣證券市場》。臺北市：早安財經文化。

(Pang, Guang-Jhieh, 2003, Gu Si: Zou Guo Ban Shih Ji De Tai Wan Jheng Chyuan Shih Chang. Taipei: Zao An Tsai Jing Wun Hua.)

彭百顯，2011，〈一代經濟學宗師的終身職志：自由——林鐘雄的經濟理想及對臺灣的大愛〉。《臺灣國際研究季刊》7(3): 21-67。DOI: 10.29800/TLSQ.201109.0002

(Pang, Pai-Hsien, 2010, Yi Dai Jing Ji Syueh Zong Shih De Jhong Shen Jhieh Jhieh: Zih You—Lin Jhong Syong De Jing Ji Li Siang Ji Duei Tai Wan De Da Ai [An Economic Grand Master's Lifelong Ambition: Liberty, Zhong-Xiong Lin's Ideal Economics and His Great Love for Taiwan]. Tai Wan Guo J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7(3): 21-67.)

期岳，1957，〈論財經政策的制定與實施〉。《財政經濟月刊》7(6): 2。

(Chi, Yueh, 1957, Lun Tsai Jing Jheng Tse De Jhieh Ding Yu Shih Shih. Tsai Jheng Jing Ji Yueh Kan 7(6): 2.)

費景漢，1982。〈利潤不能憑空製造，須建靈活市場制度〉。頁153-155，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Fei, Jing Han, 1982, Li Run Bu Neng Ping Kong Jhieh Zao, Syu Jian Ling Huo Shih Chang Jhieh Du. Pp. 153-155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黃應貴，2014，〈臺灣人類學的未來：新世紀的省思〉。《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94: 1-50。

(Huang, Ying-Kuei, 2014, Tai Wan Ren Lei Syueh De Wei Lai: Sin Shih Ji De Sing Sih [Is There A Future of Anthropology in Taiwan? Reflection for New Century]. Tai Wan She Hue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94: 1-50.)

楊雅惠，1987，〈造成目前經濟問題之原因與政府應採之因應政策，分項報告（六）：金融自由化〉。臺北市：中華經濟研究院。

(Yang, Ya-Huei, 1987, Zao Cheng Mu Chian Jing Ji Wun Ti Jhieh Yuan Yin Yu Jheng Fu Ying Tsai Jhieh Yin Ying Jheng Tse, Fen Siang Bao Gao Part VI: Jin Rong Zih You Hua. Taipei: Jhong Hua Jing Ji Yan Jiou Yu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楊雅惠，1995，〈金融獎勵措施之產業效果〉。頁103-129，收錄於楊雅惠編《臺灣產業發展與政策》。臺北市：中華經濟研究院。

Yang, Ya-Huei, 1995, Jin Rong Jiang Li Tsuo Shih Jhieh Chan Yeh Siao Guo. Pp. 103-129 in Tai Wan Chan Yeh Fa Jhan Yu Jheng Tse, edited by Ya-Huei Yang. Taipei: Jhong Hua Jing Ji Yan Jiou Yuan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經濟日報，1985，〈苯乙烯供需雙方堅持己見，產銷協議有破裂之虞〉。第3版，3月13日。

(Jing Ji Rih Bao [Economic Daily News], 1985, Ben Yi Si Gong Syu Shuang Fang Jian Chih Ji Jian, Chan Siao Sieh Yi You Po Lieh Jhieh Yu. Page 3, March 13th.)

葉萬安，1984，〈臺灣工業發展政策的研訂與實施〉。頁673-701，收錄於于宗先與劉克智編，《臺灣的工業發展》。臺北市：中研院經濟所。

(Yeh, Wan-An, 1984, Tai Wan Gong Yeh Fa Jhan Jheng Tse De Yan Ding Yu Shih Shih. Pp. 673-701 in Tai Wan De Gong Yeh Fa Jhan, edited by Zong-Sian Yu and Ke Jhieh Liu. Taipei: Jhong Yan Yuan Jing Ji Suo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cademia Sinica].)

葉萬安，2009，〈在逆境中開創臺灣經濟發展新境界——紀念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百年誕辰〉。《臺灣經濟論衡》7(4): 46-73。

(Yeh, Wan-An, 2009, Zai Ni Jing Jhong Kai Chuang Tai Wan Jing Ji Fa Jhan Sin Jing Jieh—Ji Nian Jiang Gu Zong Tong Jing Guo Sian Sheng

Bai Nian Dan Chen. Tai Wan Jing Ji Lun Heng [Taiwan Economic Forum] 7(4): 46-73.)

臺灣省新聞處，1990，〈邁向經濟自由化之路〉。臺中市：臺灣省政府。

(Tai Wan Sheng Sin Wun Chu, 1990, Mai Siang Jing Ji Zih You Hua Jhih Lu. Taichung: Tai Wan Sheng Jheng Fu [Taiw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趙耀東，1983，〈從世界工業發展趨勢，談我國現階段工業發展的問題與對策〉。《自由中國之工業》59(3): 1-6。

(Chao, Yao-Dong, 1983, Tsong Shih Jieh Gong Yeh Fa Jhan Chyu Shih, Tan Wo Guo Sian Jieh Duan Gong Yeh Fa Jhan De Wun Ti Yu Duei Tse. Zih You Jhong Guo Jhih Gong Yeh 59(3): 1-6.)

劉德宜、黃琴雅，2005，〈林鐘雄的學生們〉。《今週刊》523期。

(Liu, De-Yi and Chin-Ya Huang, 2005, Lin Jhong Syong De Syueh Sheng Men. Jin Jhou Kan [Business Today] 523.)

蔡侑霖，2017，〈晚近科學園區周遭的反農地徵收抗爭：經濟的實質意義、無常空間、與反制性運動〉。頁185-245，收錄於黃應貴、鄭璋寧主編，《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台北：群學。

(Tsai, You-Lin, 2017, Wan Jin Ke Syueh Yuan Chyu Jhou Zao De Fan Nong Di Jheng Shou Kang Jheng: Jing Ji De Shih Jhih Yi Yi, Wu Chang Kong Jian, Yu Fan Jhih Sing Yun Dong. Pp. 185-245 in Jin Rong Jing Ji, Jhu Ti Sing, Yu Sin Jhih Syu De Fu Sian [The Finance Economy, Subjectivity, and the Emerging Order], edited by Ying-Kuei Huang and Weining Cheng. Taipei: Chyun Syueh [Socio Publishing].)

蔣經國，1980，《蔣總統經國言論選集》第一輯。臺北市：中央日報出版部。

(Chiang, Ching-Kuo, 1980, Jiang Zong Tong Jing Guo Yan Lun Syuan Ji Volume I. Taipei: Jhong Yang Rih Bao Chu Ban Bu.)

蔣碩傑，1982，〈紓解工商業困境及恢復景氣途徑之商榷〉。頁71-90，收錄於工商時報編，《財經政策大辯論》。臺北市：時報文化。

(Chiang, Shuo-Jieh, 1982b, Shu Jieh Gong Shang Yeh Kun Jing Ji Huei Fu Jing Chi Tu Jing Jhih Shang Chyueh. Pp. 71-90 in Tsai Jing Jheng Tse Da Bian Lun, edited by Gong Shang Shih Bao [Commercial Times]. Taipei: Shih Bao Wun Hua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

蔣碩傑著、吳惠林譯，1985，《臺灣經濟發展的啟示》。臺北市：天下雜誌。

(Jiang, Shuo-Jieh, translated by Huei-Lin Wu, 1985, Tai Wan Jing Ji Fa Jhan De Chi Shih [Economic Take-off of Taiwan: Lesson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aipei: Tian Sia Za Jhih [CommonWealth Magazine].)

蔣碩傑、劉大中、刑慕寰、費景漢、顧應昌、鄒至莊，1995a[1974]，〈今後臺灣財經政策的研討〉。頁1-19，收錄於吳惠林編，《蔣碩傑先生建言錄》。台北：遠流。

(Chiang, Shuo-Jieh, Da-Jhong Liu, Mu-Huan Xing, Jing-Han Fei, Ying-Chang Gu and Jhih-Jhuang Zou, 1995a [1974], Jin Hou Tai Wan Tsai Jing Jheng Tse De Yan Tao. Pp. 1-20 in Jiang Shuo Jieh Sian Sheng Jian Yan Lu, edited by Huei-Lin Wu. Taipei: Yuan-Liou.)

蔣碩傑、劉大中、刑慕寰、費景漢、顧應昌、鄒至莊，1995b[1976]，〈臺灣財經政策之再檢討〉。頁25-47，收錄於吳惠林編，《蔣碩傑先生建言錄》。臺北市：遠流。

(Chiang, Shuo-Jieh, Da-Jhong Liu, Mu-Huan Xing, Jing-Han Fei, Ying-Chang Gu and Jhih-Jhuang Zou, 1995b [1976], Tai Wan Tsai Jing Jheng Tse Jhih Zai Jian Tao. Pp. 25-47 in Jiang Shuo Jieh Sian Sheng Jian Yan Lu, edited by Huei-Lin Wu. Taipei: Yuan-Liou.)

鄭優，2012，〈一代巨筆王作榮教授〉，《工商時報》A6版。

(Cheng You, 2012, Yi Dai Jyu Bi Wang Zuo Rong Jiao Shou. Gong Shang Shih Bao, page A6.)

瞿宛文，2004，〈後威權下再論「民營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3: 29-59。DOI: 10.29816/TARQSS.200403.0002

(Chu, Wan-Wen, 2004, Hou Wei Chyuan Sia Zai Lun 'Min Ying Hua' [Re-Examination Of Privatization In Post-Authoritarian Times]. Tai Wan She Hue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53: 29-59.)

瞿宛文，2011，〈民主化與經濟發展：臺灣發展型國家的不成功轉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 243-288。DOI: 10.29816/TARQSS.201109.0005

(Chu, Wan-Wen, 2011, Min Jhu Hua Yu Jing Ji Fa Jhan: Tai Wan Fa Jhan Sing Guo Jia De Bu Cheng Gong Jhuan Sing [Democratization

-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Un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s Developmental State]. *Tai Wan She Hwei Yan Jiou Ji Kan*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84: 243-288.)
- 瞿宛文、安士敦著、朱道凱譯，2003，《超越後進發展：臺灣的產業升級策略》。臺北市：聯經。
- (Chu, Wan-Wen and Shih-Dun An, translated by Dao Kai Jhu, 2003, *Chao Yueh Hou Jin Fa Jhan: Tai Wan De Chan Yeh Sheng Ji Tse Lyueh*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 Taipei: Lian Jing [Linking Publishing].)
- Arnold, Walter, 1989, "Bureaucratic Politics, State Capacity, and Taiwan's Automobile Industrial Policy." *Modern China* 15(2): 178-214. DOI: 10.1177/009770048901500203
- Block, Fred, 2003, "Karl Polanyi and the writing of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2: 275-306.
- Blyth, Mark, 2002, *Great Transformations: Economic Idea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yth, Mark, 2007, "When Liberalisms Change: Comparing the Politics of Deflations and Inflations." Pp. 71-96 in *Neoliberalism: National and Regional Experiments with Global Ideas*, edited by Ravi K. Roy, Arthur T. Denzau and Thomas D. Willett. London: Routledge.
- Centeno, Miguel A., and Joseph N. Cohen, 2012, "The Arch of Neoliber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1): 317-340. DOI: 10.1146/annurev-soc-081309-150235
- Cheng, Tun-Jen, and Pei-Chen Chang, 2003, "Limits of Statecraft: Taiwan's Political Economy under Lee Teng-Hui." Pp. 113-148 in *Sayonara to the Lee Teng-Hui Era*, edited by Wei-Chin Lee, and T. Y. Wang.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Chu, Yun-Han, 1994, "The Realignment of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and Regime Transition in Taiwan." Pp. 113-141 in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in Industrializing Asia*, edited by Andrew MacIntyre.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 Chu, Yun-Han, 1999, "Surviving the East Asian Financial Storm: The

-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aiwan's Economic Resilience." Pp. 184-202 in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edited by T. J. Pempe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DOI: 10.7591/9781501729379-013
- Chu, Yun-Han, 2007, "Re-engineering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aiwan in Defiance of Neoliberalism." Pp. 91-121 in *Neoliberalism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East Asia*, edited by Meredith Jung-En Woo. New York: Palgrave. DOI: 10.1057/9780230590342_4
- Dent, Christopher M, 2003, "Taiwan'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The 'Liberalization Plus' Approach of an Evolving Developmental State." *Modern Asian Studies* 37(2): 461-483. DOI: 10.1017/S0026749X03002087
- Dobbin, Frank, 1997, *Forging Industrial Policy: The United State, Britain, and France in the Railway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ei, John, 1992,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p. 3-24 in *Taiwan's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Perspective*, edited by N. T. Wang. Armonk: M. E. Sharpe.
- Fourcade-Gourinchas, Marion, 2006, "The Construction of a Global Profess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1): 145-194. DOI: 10.1086/502693
- Gold, Thomas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New York: M.E. Sharpe.
- Hall, Peter A., 1986, *Governing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1989, "Conclusion: The Politics of Keynesian Ideas." Pp. 361-391 in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edited by Peter A. H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all, Peter A.,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25(3): 275-296. DOI: 10.2307/422246
- Hall, Peter A., and Michéle Lamont, eds, 2013, *Social Resilience in the*

- Neoliberal Er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ueh, Li-Min, Chen-Kuo Hsu, and Dwight H. Perkins, 2001,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Structural Change, 1979-1996." Pp. 53-73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1945-1998*, edited by Li-Min Hsueh, Chen-Kuo Hsu, and Dwight H. Perk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Kuo, Tai-chun, and Ramon H. Myers, 2012, *Taiwan'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Lead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1949-196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nnheim, Karl, 1991,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 McBeath, Gerald A., 1997, "Taiwan Privatizes by Fits and Starts." *Asian Survey* 37(12): 1145-1162.
-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 251-267. DOI: 10.2307/2586011
- Polanyi, Karl, 2001[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 Roemer, Michael and Chou Ji, 2001, "Macroeconomic Policy." Pp. 115-150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e: The Changing Role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in the Economy, 1945-1998*, edited by Li-Min Hsueh, Chen-Kuo Hsu, and Dwight H. Perk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Chung-hua Institution for Economic Research.
- Schive, Chi, 1999, "How Was Taiwan's Economy Opened Up? The Foreign Factor in Appraisal." Pp. 32-50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Development into the 21st Century*, edited by Gustav Ranis, Sheng-Cheng Hu, and Yun-Peng Chu.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 Shea, Jia-Dong and Ya-Hwei Yang, 1994, "Taiwan's Financial System and

- the Allocation of Investment Funds.” Pp. 90-112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Taiwan’s Development*, edited by Joel D. Aberbach, David Dollar and Kenneth L. Sokoloff. New York: M. E. Sharpe.
- Stone, Deborah A., 1989, “Causal Stor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Policy Agenda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4(2): 281-300. DOI: 10.2307/2151585
- Streeck, Wolfgang, and Kathleen Thelen, 2005,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Pp. 1-39 in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edited by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DOI: 10.2307/2095521
- Thurbon, Elizabeth, 2001, “Two Paths to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The Pacific Review* 14(2): 241-267. DOI: 10.1080/09512740122132
- Tsai, Ming-Chang, 2001, “Dependency, the State and Class in the Neoliberal Transition of Taiw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3): 359-379. DOI: 10.1080/01436590120061651
- Wade, Robert, 1990, *Governing the Market: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Industrializ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eber, Max, 1958,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ited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iss, Linda, 2000, “Developmental States in Transition: Adapting, Dismantling, Innovating, Not ‘Normalizing’.” *The Pacific Review* 13(1): 21-55. DOI: 10.1080/095127400363631
- Wu, Yongping, 2005, *A Political Explan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State Survival,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Making of Taiwan’s Economy, 1950-198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